

城署营造

双城烟雨话变迁

余姚，襟江带海，南连台嵎，北临钱塘，东连宁郡，西望越城。四围聚落，云树依依。作为一座县级城市，有着与其他各县不同的特点。天下各县县城大多唯有一座城池，余姚却有着江南、江北两座城池，再加上环玉皇山的一座小烽火城，故此有一县三城之说。江南、江北两座城池构筑时间先后相隔较长，江北城池始筑于东汉末，时间较早，故称之为江北古城；江南城池始筑于明嘉靖时期，比江北古城迟了1300多年，故称之为江南新城。

余姚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时虽已建置为县，但并未构筑城池，由于文献资料欠缺，未知委任余姚县官者。历秦、两汉，至三国混战时期，正确地说，还属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才知有东吴君主孙权派出他的同学、东吴大将朱然，来到余姚担任余姚县官，时称“余姚长”，是为有姓名可知的余姚县官。

朱然是孙权的同学好友，东汉建安五年，孙策被人刺死，就由弟孙权继位为东吴君主，他看到余姚为浙东重镇，有着较高的战略地位，即委任朱然为余姚长。朱然与孙权同年，才19岁。朱然身材短小，但智略过人，战功卓著。因当时三国鼎立，战事频仍，朱然时常在外率军征战，雨露战场，在余姚时日不多，为余姚的政绩无可考见，唯余姚之城池，实为朱然所始筑。

朱然以他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认为余姚地处浙东要冲，可控扼吴越，乃决定在姚江北岸构筑城池。始筑的余姚县城，濒临姚江，在龙泉山之东麓，周围仅1里250步，高1丈，厚2丈^①。虽未将龙泉山包裹在内，但已把秘图山作为城中的制高点。背依秘图山，坐北朝南，建筑起县衙门，基本形成了县衙门的格局，是浙东地区建筑较早的县级城池和县衙。按《水经注》载：“江水流经绪山南，又东经余姚县故城南。”绪山即龙泉山，城在龙泉山之东，说明始筑之城规模不大，尚未将龙泉山围筑城内。

时隔1100余年之后，即到元代的至正十九年（1359）秋，方国珍占据

浙东，认为余姚为吴越要冲之地，宜宿重兵镇守。既驻重兵又储粮饷，就该对余姚江北古城进行扩建。即召鄞县、慈溪县、奉化县之民，分段承担。自九月至十月，仅历时一月有余，筑城墙一千四百六十五丈，延袤九里，龙泉山遂包裹在城内，成为具有特色的余姚县城内的制高点。城高一丈八尺，基广二丈，内外皆石砌，增筑女墙达一千八百零二堞。开陆门五：东通德门（清乾隆时改称澄清门），西龙泉门（乾隆时改称迎恩门），南齐政门，北武胜门、后清门（乾隆时改称侯青门）。有水陆门三：东水闾、西水闾、升龙门（俗呼小南门）。成为防守稳固的浙东重镇。南面仍以姚江为濠，东、西、北三面环城挖掘护城河，并可通舟楫。到明洪武二十年（1387），大将军汤和略地东浙，以余姚为要害之地，用制险塞，即命绍兴后千户所孙仁增负责增治余姚城池，并置千户所守御余姚城。至嘉靖中期，倭患日繁，而城渐废圯，即由知县郑存仁、李伯生相继缮葺完饬。

时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鉴于当时浙东抗清形势严峻，清政府为了对付抗清义军，即增筑江北城。自后又经乾隆年间、咸丰年间先后进行补筑。江北古城就此经历代多次扩建，才逐步扩展至后来的规模。

现在再说江南新城的构筑。

明代嘉靖年间，倭患频仍，倭寇自甬江入西，泛舟姚江，沿江烧掠西上，一直抢劫到上虞、绍兴为止，姚江两岸百姓深受其害，各乡震恐。每当发生寇警，城外百姓避兵入城，至江北城池不能容纳。又，江南岸人口日繁，又是孔庙、学宫和仓廩所在之处。每当倭寇登岸，江南即处于极端危险之境地。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退居在家的大学士吕本见此情景，即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疏，阐明利害，奏请增筑江南新城。由于吕本在朝廷中的特殊声望，更由于倭患对浙东地区的严重破坏，损失深重，嘉靖皇帝当即批准了增筑余姚江南城池的奏疏，经由时任首辅大学士徐阶批转，交由浙江总督胡宗宪典领其事。胡宗宪早年曾任余姚知县，与余姚也有着极好的关系，他戮力经营，当即召集嵎县、上虞县、余姚县三县民工，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动工，于次年六月竣工，仅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用银53300余两，即筑成了江南新城池，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江南新城周

^①编者按：今1丈=3.3333……米

长1440余丈，设陆门四，为东泰门、西成门、南明门、北固门，四门之上皆建有敌楼。四周挖濠通江，引江水以环之。又设小陆门两处一恩波门、流泽门（乾隆时改称东旱门、西旱门），以方便交通；水门两处：左通门、右达门。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马从龙采纳诸生建议，于城之东南增开水门，名巽水门，引九曲之水至学宫前泮池。后又于大黄桥之西增开小黄桥水门，于南明门之西增开南水门，以通水流人行。更于北固门、西成门、南明门（乾隆时改称南溟门）重建月城（瓮城），以增强防守力量。北固门上的北固楼正与北城的舜江楼相对，通济桥横贯其中，南、北两城相通为一。正如古人所言：“城形双璧合，桥势断虹浮。”

江南新城筑成之后，成了浙东之屏蔽。四邻有警，恃而无恐。每当倭寇来犯，即于舜江楼上发出警报，撞响大铜钟，两城军民人等全都上城防守，听从舜江楼中的鼓声指挥，用弓箭、石块、烟火等拦击姚江中的倭寇，把倭寇打退，阻止了倭寇沿江西上。然后，舜江楼中敲动云板、钟鼓，奏出得胜乐曲，来庆祝抗倭斗争的胜利。对此，嘉靖三十九年，首辅大学士徐阶撰有《余姚县新城记》文，钦差总督浙直福建等处军务胡宗宪和余姚知县立石刻碑，竖立于姚江岸边，碑文对余姚人民抗倭斗争中的英雄业绩做了高度的赞扬。

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政府欲扑灭四明大岚山的抗清烽火，遏制浙东人民的自卫战争。而江南城正处在大岚抗清义军南下之要冲，清政府一面设置大岚都司用来绥靖地方，一面在增筑江北古城的同时，特将江南城池进行增修，南北城墙各增高5尺，以增强防守的力度。

南、北两城于1930年、1937年先后两次拆除。1930年仅拆除北城东起和鸣桥、西至牌轩下的一段滨江城墙，保留舜江楼，在城墙原基之上建造商店用房，开辟成沿江街道。抗战时期，为避免城池被日寇所利用，又为便于城内百姓躲避敌机投炸弹时的疏散，遂于1937年至1938年间拆除南、北两城全部城墙。时有邑人邵之传等，特将南溟门城门洞移建至南黄山上谭家岭西侧的瓜瓞岭顶，额题“瓜瓞亭”，以留作纪念，又可供过岭路人途中休憩。南、北城墙拆除后，城墙基址大部分改作马路，即现在的城下路、舜水路之西南段和龙泉山西面段、南北滨江路、三官堂路、南河沿路等。

余姚衙门说古今

余姚衙门的营建随着三国时余姚长朱然的到任而开始。由于始建余姚县城池时以秘图山作为城内的制高点，就选择秘图山前的高凸地作为余姚县衙的营建地，秘图山也就成了县衙所背依的一座山。由余姚长朱然所营建的县衙具体格局，因文献资料的缺乏，已无法考索。按现有资料，只能自宋代之后简略考见之。

县署

按写于南宋的《嘉泰会稽志·余姚县》条载：“秘图山，在县北六十七步。《旧经》云上有石匱，夏禹所藏灵秘图之所。旧号方丈山，唐天宝六年（747）改今名。上有严公堂、高风阁，皆以子陵而名。此山旧为寿圣观址，县治在其南麓，观既废于南宋建炎（1127—1130）兵火，遂以弓手营地为广福观，易之以广县治。”由此看来，南宋建炎年间，余姚县衙的占地面积尚小，仅占有秘图山前范围。自建炎兵火之后，把寿圣观迁建于弓手营地，易名为广福观，而将秘图山完全扩建为县衙，才得以开拓面积，共达43亩，形成后来完整的县衙格局。县衙西临虞宦街，这里就成了姚江流域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历代延续不替。

经扩建之后的县衙，格局完整。坐北朝南，以治堂为轴心，左右前后依次构建。治堂曰正厅，即是县令理事之所，堂前挖掘一池，种植荷花，称之为秘图湖，形成背山面水的基本格局。左边为东厅，后面为清心堂，清心堂的左面为不欺堂、夹堂；直北有一池，池上有轩，曰鉴止轩。轩稍东有芙蓉亭。亭南折而东有翰墨堂，由县令施宿立石镌刻苏东坡手迹，收藏于此。秘图山下瞰秘图湖，建阁曰秘图阁，后改为翠窠亭。稍西30步许有秀野亭。两亭中间北望，可见客星山，故又于此建亭，称之为吊隐亭。吊隐亭的南边下方建有高风阁，阁前建严公堂，均以寓悼念严子陵之意。宋代诗人李光写有《寄题余姚徐宰新作严公堂》，诗较长，内中有句曰：

“子陵古真隐，逸气横九州。平生江海志，自比巢与由。……人物浪淘尽，英名至今留。当年渔钓地，陈迹余荒丘。……作堂名严公，怀贤慕前修。……严子定不死，吾将从之游。”

由治堂向南，依次即有仪门、谯楼、承宣亭。治堂东边50步是主簿（相当于现今的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办事处，称簿廨；再东30步即是县丞的办公处，称丞廨，有小室名曰“龟巢”。

到南宋末的德祐二年（1276），宋帅张世杰为避元兵，率军南撤，途经余姚，命令兵士放火烧掉了县衙。到元代的至元、皇庆年间（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才重新修建，公署堂廨，依然旧观。于秘图湖前增建“爱莲堂”，于故承宣亭址建舜江楼；于故翠窠亭址建“雩咏亭”；治堂3间改题曰“瑞柏堂”。

到明万历十二年（1584），因岁久废圯，知县丁懋逊重建时，改题治堂作“亲民堂”。治堂东南掖下为幕厅3间，西掖下为县库1间、书房1间。治堂正南面对戒石亭，亭中置有一块戒石，上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字的《戒石铭》。此《戒石铭》取自五代蜀国君主孟昶的《令箴》，自北宋始即以此作为警句，用来提醒为官者廉洁公正。亭南即为仪门3座，左右为耳房10间、吏廊21间，为司吏、典吏、属吏的办公用房。吏廊之北有寅畏堂1间。仪门外东边有迎宾馆3间、土地祠3间、申明亭1间；西边为狱官厅1间、囚房9间、旌善亭1间。按：申明、旌善两亭，为明初洪武四年（1371）诏告天下，各县置建申明、旌善亭，纪善以重良民，纪恶以警莠民，用来劝善化导。

治堂之后为仪仗库、架阁库、须知房、茶房、銮驾库，再北即为秘图湖，曰瑞莲池。过池有亭，初名考祥亭，后由知县马从龙改题为似玩亭。秘图山的坡面上为县令的日常办事处，称令廨，共6间。令廨之左为丞廨，右为簿廨，前为典史廨、吏廨。

到清乾隆十九年（1754），改题治堂为“乐只堂”。治堂正南面对戒石碑，北向仍刻上述16字《戒石铭》，南向刻“公生明”3字。“公生明”

3字取自《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语，谓公正无私则能明察事理。再南为仪门3座，甬道左右为吏廊共16间，仪门两翼为皂班、快班、壮班三班用房9间。仪门外左侧是土地祠，右侧为监狱。正南头门上设谯楼5间，头门外设立木壁为树塞。治堂后的秘图湖上建造石桥，过桥即为令署内堂，仍旧，只将内厅改题作“学古堂”。堂之东边为库房，西边为签押房；宅门之西为赃罚库、群房；内堂之东为书室；内堂之北当秘图山脊下为内室、厨房、西书房。签押房之西有客厅5间，有茶房、厨房各3间。秘图山脊设有巡更房1间。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东进入浙，烧毁了大部分县衙房屋，到同治元年（1862），由知县陶云升次第修缮，规制略如旧观。将治堂复改题曰“亲民堂”。东首为粮柜房、廊科房；甬道中建有戒石亭，内置戒石坊；南为仪门，两翼为民壮房、快手房各3间，往南之左为土地祠；右为监狱头门，内置狱官厅、签押房、提牢房、赃罚房、枕房、男监、女监。两边各置申明、旌善亭，直南为头门五间，上置谯楼，两翼为皂隶房、捕役房各3间。又南为木壁1座。

此外还筑有令廨、丞廨、簿廨、尉廨、幕厅、库房、书房、巡更房、花厅等公廨用房，四周还点缀有翰墨堂、芙蓉亭、秘图阁、秀野亭、高风阁、严公堂、雩咏亭、迎宾馆等。秘图山前还竖有“神禹秘图”碑刻。

至光绪十七年（1891），知县周炳麟于秘图湖旁原考祥亭遗址建芳洁亭。过湖上石桥而北，西侧有待质所、轿房（后改为库房）；东侧有宅门、东西门房、三堂，稍西为签押房3间、花厅5间、上房5间、东西书房9间、蓬莱阁5间、厨房3间、茶房3间。

县衙之东紧依城隍庙。县衙东南为试院。在清同治之前，凡遇县试，即暂以县署做试场。至同治十一年（1872）由邑人朱久香等稟请知县陶云升允准，遂于县署东南侧，城隍庙的西至南侧，划地创建，建号舍4进，共60间。另有土地堂1间，阅卷房4间，厨房2间，头门3间，有甬道、龙门、角门。正厅曰达善堂，取由此以选者，人志于达则兼济天下之意。试院东

临县东街，有巡防署、城守署。

民国初，县行政长官改称县知事，县衙改作县公署，内设政务、财务、教育等科。民国十六年县知事改称县长，改县公署为县政府，内设总务、财政、教育、民治、建设等科。民国十八年，县政府改组，设秘书室和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四局，民政、总务两科。民国二十四年，实施新县制改革，县政府裁局设科。民国三十年，余姚沦陷，县政府迁入浙南山区。日寇扶植傀儡政权，设余姚县地方维持会（不久改为余姚县乡镇联合自治会），下辖秘书、民政、财政、教育科和司法承审室等。民国三十二年，汪伪余姚县政府成立，下属机构不变，直至民国三十四年日寇投降，汪伪余姚县政府垮台，民国余姚县政府才得以回归姚城，于县署原址治理县事。民国三十五年，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社会、军事、地政七科，警察局，秘书、会计、统计、军法、合作指导等五室。民国三十六年裁革军法室。自后一直到余姚解放，县政府无多大变动。

在民国期间，县署内建筑无多大变动，唯在抗战前夕，县署头门进行改建，由原宫殿式改建成中西结合式，呈3层楼状，下为圆洞门。

1949年6月，余姚县人民政府成立，中共余姚县委亦在县署内办公。20世纪50年代，县署内建筑开始改建，拆除宫殿式结构用房，代之以青灰砖瓦楼房。将原试院改建为人民大会堂。1954年，设立余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6年，设立政协余姚县委员会，两委员会同在县署内办公。自此之后，形成四套班子同在县署内办公的格局。1995年春，余姚市政府搬迁至新址办公，原市署卖给商业部门房地产公司，做开发房地产经营之用。由此，历时1790余年，格局完整的，余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在的古县衙遗存，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尉廨

尉廨原在治东一里，名曰二槐堂。宋代曾先后为余姚县尉史浩、魏杞居所，两人后官至丞相，后人故此称之为尉廨。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典史谭际甲以养廉银重修之，共有厅事房屋20间，一度用作典

史房。后被太平军焚毁，于光绪元年（1875）由知县陶云升重修之。

都察院行署

都察院主察内外百司之官，设13道监察御史，分巡各省。浙江省有10名监察御史巡视各州县，按察府州县官，巡视仓库，查算钱粮，提督学校，扬善剪豪，正风俗，振纲纪。凡辖内官员犯罪，御史未能及时举察，与犯官同罪处置；凡御史犯罪，加三等。驻余姚县都察院行署在县衙东北百余步处，原为布政分司遗址，嘉靖中期改为都察院行署，民间称之为后司，今所称都司前即其遗址。

布政分司

承宣布政使司是职掌全省行政的机关。为方便管理，特分全省为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由布政司参政或参议常驻分司，分理诸道事务。余姚县属宁绍台道，驻余姚司址在县衙东北百余步处。嘉靖二十年（1541），因原址改为都察院行署，遂由通判署县事叶金于原府馆旧址改建，面对城墙为前门，有仪门、厅事、川堂、后寝、耳房等。

按察分司

提刑按察使司职掌全省刑名案劾之事，为方便按察，遂分全省为杭严道、宁绍道、嘉湖道、金衢道，由按察副使或佥事常驻分司，分理诸道按察事务。余姚县属宁绍道，驻余姚司址在由布政分司折向北50步，于县衙东门之内，即为明代按察分司，规模与都察院行署相等。其址在宋代曾是丞廨、簿廨办事厅，至元代时又曾是方国珍元帅行署。

余姚千户所

明初洪武年间，于各军事要地置千户所，余姚县遂置守御千户所，设正千户1人，职正五品，率军1120人，直属于浙江省都指挥使。司即驻扎余姚城中。至正统年间奏革，即于其址改建布政分司，至嘉靖二十年（1541）又改建为都察院行署。

尉司

元代时，为强化对盗匪的搜捕，特建捕盗司，地址在县城之东的酱园街，面对姚江。至明清时即于其址改建姚江驿。

汤和筑临山卫城

明代初年，为防御倭寇，孤立张士诚、方国珍流亡势力，实行海禁政策。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严厉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

明洪武二十年（1387），大将军汤和略地东浙，以余姚为要害之地，用制险塞，即命绍兴后千户所孙仁增负责增治余姚城池，并置千户所守余姚城。为防御倭寇，严厉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与此同时，还添筑了两座城池，一为临山卫城，一为三山所城。

临山地处会稽山与四明山之间，界跨明、越两州，地衔海陆；北临杭州湾，东西连接余姚、上虞两邑之疆界，地貌径直坦夷。卫城南北坐龟凤两山之间，蜿蜒而秀拔；夏盖山雄峙于西，东山绵亘于东；往南可以直插余姚，进入四明山；往北可下海控扼海疆。雄踞姚北，势跨浙东，真是天造地设之寰区、东南之巨镇。

此地的前身是庙山巡检司，小土城，原属兰风乡。庙山有寨，有土军百人。明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大将军汤和巡视浙东沿海，从战略攻守出发，发现这里是海防重地，遂向朝廷奏疏：“余姚控引大海，宜于其北边置卫所巡司，二十里一城，以备倭寇。”提出改筑卫城。奏疏得到朝廷批准，遂交由本卫指挥使武英监督筑成。遂将庙山寨西徙至上虞县第五都中原堰故嵩城，于此新设临山卫城，卫城坐落于余姚县东山乡三里三都。次年城成，因其依山临海而筑城，遂名临山卫，建戍设官以镇守之。驻军5600名，由卫指挥司管理。城内设左中右前后5000户所，东辖三山所、西辖上虞县的沂海所。与观海卫、定海卫并称浙东三卫。清康熙八年（1669），于临山卫复置巡检司，驻绿营兵。

临山境内主要有凤山，东与庙山相连。庙山，即临山，依大古塘，以姚娘庙得名。《东山志》按：宋时有庙山寨，元有庙山巡检司，城皆跨山，据险以守。逮明建卫拓城，倚山临海，因卫设名，非别有一临山也。

又，宋时庙在建城处，后改今所，而人遂指城北迤陇为庙山云。有龟山，在临山卫城南门，与凤山分峙南北。有老寨山，在临山卫西一里，一名陆家山，晋时海寇孙恩结寨于此。又名蛇山，产异蛇，好事者以石山形似龙，并城内龟凤二山，目为四灵。有欢喜岭，在临山西门外，与老寨山连为卫城，出兰风要道。

三山守御千户所在梅川一都之浒山，俗呼浒山城，东应观海，西接临山，三山巡检司驻此。观海卫，明洪武十九年（1386）十一月置，洪武二十年城墙筑成，由余姚与慈溪分辖，慈溪辖东南半城，余姚辖西北半城。

余姚学宫

学宫的作用

学宫，又称孔庙，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教育中心。“学宫”一词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与后世经常使用的“辟雍”一词意义相同，是周天子设立的大学，专门教授学子和贵族子弟的场所。

教育历来为立国之本，各个历史时期，每个王朝均诏告各地兴建学宫，以培养学子，为国家准备人才。在当时，人才的培养，基础教育（启蒙教育）由各家族、村庄、乡镇所举办的学馆（家塾、私塾、社学）来承担，较高等的就是书院（私学）和学宫（官学）的职责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官学与私学，两者并存发展，形成了古代教育的完整结构。高等教育之完成，除先生弟子私相授受之外，主要在于学校，孔庙和学宫也就成了各地高等教育程度的象征。

立学之举，发端于周代。按《学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谓之“大成”。所以，孔庙和学宫里都有大成殿。

汉武帝时开始兴建太学，同时诏令天下郡县广建学宫，劝谕官民子弟皆得入学。至汉明帝永平二年（59）时，令天下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即有学庙。

历史上孔庙最多时有2000多所，根据其性质或类别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孔氏家庙，二是国庙，三是学庙。第一类的孔氏家庙，历史上有两座，其一即是曲阜孔庙。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次年他的弟子将其居住的3间小屋改造成庙堂，由孔氏族人供奉之。其二，宋室南渡后，孔子后裔第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迁至浙江衢州而建立的衢州家庙。

第二类国庙性质的孔庙，如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它们与“学校”

没有关系，是历代帝王、地方官员祭祀孔子的专用庙宇。这类孔庙只有曲阜孔庙、北京孔庙、曲阜孔府内的家庙、衢州家庙，仅此4座。作为国庙性质的孔庙，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此外各地方的孔庙即为第三类的学庙，是学和庙相结合的性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学子的场所。学庙或称庙学，是以办学为宗旨，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字相结合的国家行政教育场所和祭孔场所，由“教谕”官员管理，重在学习。其中也包括历代的京师太学或国子监。

中国古代的正统官学是儒学，儒学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支柱。具体表现为三大支柱：一是朝廷的治国理论，二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三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庙学宫。三者互为联系，互为因果。

《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办好各级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来训导学子，那么，人人都会敬老尊贤，须发花白的老人便不会背负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

由于中国历代尊孔崇儒，各地广建孔庙。在明代，全国有孔庙1560余座；清代，有孔庙2000余座。这些孔庙分布于全国各地，至今保存尚好的有500余座，其中保存基本完整的有百余座。由于保存之艰难，这些幸存下来的文庙和孔庙大部分都被公布为全国、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曲阜孔庙于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县学，即县一级的学宫，历来是全县教育之中心。汉代时的县学，由乡大夫、乡老执行教授之责。教授内容有3项：一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放纵）、恤（关爱），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每3年一考，考查学子的德、行、道、义。

县学入学名额亦有规定：唐代规定的县学生徒名额为上等县40名，中等县30名，下等县20名。得以录取入学的生徒经过几年学习，即可赴省里

参加乡试和上京参加会试，经吏部考试合格者即可授官。余姚属上等县，按规定每年招收新生员40名，正式名称为“廩膳生”，民间称作“秀才”。能够进入县学读书的弟子受到士人和普通群众的青睐，声望较高。正式名额之外也可以扩招，这就是“廩膳生”之外的“附生”。虽然附生不是正式名额，但是当“廩膳生”成绩优异被推荐入京，成为“贡生”，空缺出来的正式名额即由附生添补。

同是学宫的教官，名目却不同，府学叫教授，州学叫学正，县学叫教谕，这都算是学校的正堂官；此外又都有助教，无论府州县，都叫作训导。在平时，对教官一般都通称老师。按当初的规定，中了秀才之后，须每天住在学宫中受教，不但讲学问，而且讲伦常；如果某教官有学问，私收学生，这即是开私馆，即如现在的教师在家里开补习班。教官虽然不像官，却很清高，平常不行官场之礼。教官的官阶品位很低（教授从九品，教谕、训导、学正没有官品，不入流），但人人都称先生，见了官员不用下跪；见知县、藩台、督抚，都可以长揖不跪。只有见了钦差大人例外。教官与官员比较，显得稍微辛苦，但比乡间的私塾老师要富足，每年有一定的俸禄；3年一考，又有进项。乡间教私馆的教师，每年至多20两银子的束脩而已。当了教官，还可以一面做着官，一面仍可以预备参加会试，还有中进士、升任官职的机会。

余姚学宫的历史变迁

余姚学宫出现较早，东汉时期即有余姚学宫的记载。自汉代虞氏家族学术兴起，代不乏人，经生学子祭祀孔子，习熟先儒成说，皆出于学宫，学宫遂成为余姚教育之中心所在。正如黄宗羲所言：“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自此之后，君子振奋，学风高扬；先贤之精神，后学之书声，互相激励，先后出现文人学士、巾幗名媛，为姚江文明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形成“姚江人物甲天下”的局面。

自汉代至北宋时期，余姚学宫位处县衙西南200步位置。《光绪余姚县

志·学校》载：余姚最早的县学位置在县治西南1里（约500米）、姚江南岸，上寺桥、下寺桥之间。依《韩诗外传》“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后世即以桃李多果实用来比喻栽培门生之众。亦如白居易诗所言：“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故此学宫之北辟有桃园，后来留存“桃园弄”地名。桃园弄之侧即是汉代名宦黄昌故宅，按《后汉书·黄昌传》载：“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学宫，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累官至大司农。黄昌宅北面临姚江，至今留有大黄桥、小黄桥的地名。由此证明，东汉时余姚县学位置即在黄昌宅（大黄桥）附近。

余姚自汉代建县学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凡在家自学有成的士子，均可向县学报名求试，经考试合格后入学。经过3~5年的学习，学业有成，即由县按明经、孝廉、茂才等名目向朝廷推举，经考试录用，入仕任职。

自从隋代时施行科举制度开始，学宫即成为秀才、举人、进士“三大考”中第一考“县试秀才”的教学基地，真正成为官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始建的余姚学宫规模较小，经过宋、元、明、清的不断拓展，尤其是宋代的迁建，才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群，成为具有东方建筑特色、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学宫。

北宋前期，余姚县学地方狭窄，生员学习条件较差。宋庆历七年（1047），新任知县谢景初一到余姚上任，就将整顿、扩建学宫放在首要议事日程上。经过县令谢景初的努力，众多乡绅、学人的慷慨捐助，孔庙和学宫的规模不断扩大，招收生徒增加，整顿之后的新县学随即扩招学生200余名。处理政务之暇，谢景初还时常到县学亲自讲解经学和文学。由于谢景初治姚有方，史书称他“贤县令”。

20多年后，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下旨：“凡县学以时选取其优者升州学，为外舍生。凡县学设学长一人，教授、教谕、直学、斋长、斋谕

各一人。生员，大县五十人，次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就在这一形势之下，3年后的熙宁九年，黄铸担任余姚知县。黄铸在任两年期间，对余姚教育进行多方调查、了解，深深感到现有的县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亟须进一步扩建。他知道余姚的官宦世家莫氏，居于姚江南岸莫家弄，家多余财。他即动员承袭将仕郎的莫当拿出积蓄银两，于县衙东南方买得空余宅基地，即现在的学弄内学宫旧址，东西宽200余步，南北深88步，共30余亩，将此地基送给国家。于是开始筹划迁建学宫事宜。经过两年时间的营造，至元丰元年（1078）黄铸知县即将这块地基用来迁建县学（现在的学弄内学宫旧址），四周开通各广3步的四衢：南为学弄，北为醮醮弄（现改称杜义弄），东为举弄，西为糞（hóng）弄，以通四方来学之士；学弄之南开凿泮（pàn）池，学弄之东端跨石巍江建棂星桥，桥之西端建一牌坊，西端至南雷路处亦建一牌坊，学宫正门建明伦坊。一座规模空前的新县学不久即建树起来，闹中取静，环境幽雅，气势恢宏。入学弟子有了宽敞的学习环境，教育盛况空前。

至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有正式名额廩膳生40名，此外有附生百余名，与廩膳生共同学习。县治西南的旧县学遗址，在过了几年之后，被他人移用做了寺院，后才有了上寺桥、下寺桥的两处地名。

两宋之际，金兵追康王赵构入浙。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康王经余姚至明州（宁波）入海，金兵经余姚追至明州，追康王不获，被明州制置使张俊战败，于建炎四年正月逃归余姚，焚县衙、城楼、姚江桥、庙宇等，独学宫未焚。

南宋中兴之后，由于经过战乱，经济来源枯竭，学廩的年收入只有500多石，学舍年久失修。于是，绍兴五年（1135）的余姚知县徐端礼，绍兴七年的知县赵子灞，绍兴十五年的县尉史浩，关注余姚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治道之大本，庠序是教化之先务，主动捐出私俸以倡学，先后增建讲堂、斋舍、射圃、观德亭、绎志亭。庆元五年（1199），知县施宿增建值舍作为致斋、考课之所；扩建正门，气势宏大壮观。

咸淳九年（1273），知县赵崇简认为余姚“为帝舜旧地也，设学校以教人，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家之所以和，国之所以治”。对县学进行全面整修：学宫内东轴线为文昌阁、崇圣祠，作为祭祀先师之所，后面即为土谷祠、魁星阁、训导署、教谕署等办公用舍。中轴线有棂星门、儒学门、东西庑廊、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西轴线在修整斋堂、号舍时，更新建乡贤祠、名宦祠、忠义祠，气象宏大，形成体势完备的格局。赵崇简知县更向生徒说：“今之教即古之教也。古无利禄之诱，今有利禄诱之。”要求学生以读书来学习做人，不要以读书来追求做官、发财，把它当作进入仕途之门的敲门砖。

宋末，德祐二年（1276）正月，宋帝由杭州出逃。宋军的承宣使张世杰率官军躲避元军追索，向东逃亡途经余姚时，无能力约束部下，竟放任部属纵火，将县衙、寺庙、民居一起焚毁殆尽，县学也在这次焚城中被毁。

元至元十四年（1277），县令杜仲仁重建学宫。至元二十八年，廉访使王侯扩建舍屋129间，复置学职，县升为州，称州学。

明洪武二年（1369），复降州为县，仍称县学。竖石碑于学宫正门外东西两侧，上书“文武百官军民人等至此下轿下马”。置教一员、训导二员、廩膳生四十员、附生无定额。在东轴线修葺文庙，祭祀孔子，旁立十哲配享。嘉靖十年，改称先师庙。自嘉靖之后，由于余姚出了先贤王阳明，朝廷规定每年给余姚增加生员10名，所以余姚可以每年招收50名生员。隆庆、万历年间，由公费修缮，陆续重建、扩建有启圣宫、文昌阁、魁星阁、明伦堂、尊经阁、昌黎祠、乡贤祠、名宦祠、忠义祠、修业斋、校经处、崇圣祠、大成殿等。读书之风兴盛，学宫更加兴旺。朱舜水赴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光国曾要求朱舜水按余姚学宫规模绘图，在日本建造学宫和孔庙。

入清，顺治年间知县胥庭清重建学宫。康熙年间知县康如连和教谕、

训导，各出私资重修“启圣宫”。乾隆年间知县赵预、进士陆烈等出资重修文昌阁，改称魁星阁。又有知县程明憐募捐500两银子，正门外增建两座射圃石桥。咸丰十一年（1861），余姚发生十八局佃农起义，三打余姚城，烧毁学宫。至同治五年（1866）和同治十年，知县陶云升会同退职在家的学政朱兰，先后两次各出私俸银两，修建考棚、学舍，广购经籍，诱掖学子勤奋力学。

学宫虽然屡遭火灾，但由于余姚人对教育的重视，邑人捐资兴学踊跃，据《乾隆余姚县志》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知县唐若瀛核实捐献的学田就达三百零四亩有余。于是就屡毁屡建，规模愈建愈宏丽，在全国县级学宫中，余姚县学最为庞大，成为诸邑之冠，沿至清末不变。

余姚学宫的形制布局

余姚学宫的建筑按三条轴线布局：东轴线为崇圣宫，中轴线为棂星门、大成殿、明伦堂；西轴线为名宦祠、乡贤祠等祠宇。这就是左庙右学的正规布局，是唐代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地方庙学的定型格局，其源于《周礼》中尚左之制，根据“左祖”原则，先圣先师之庙建在学宫之左。

全盛时期的余姚学宫，东西宽达200余步，南北深388步，可容纳学子200余人。四周有朱红色围墙环绕，四面开通各广三步的四衢：南为学弄，北为醮醮弄（现称杜义弄），东为举弄（余姚方言，“举”与“鬼”同音，民间遂误称为鬼弄），西为糞（hóng）弄，以通四方来学之士。

正对学宫大门之南的学弄南侧，凿有泮池，东西宽南北长各4丈余，池水与石巍桥江相通。这又是余姚学宫不同于其他各县学宫的地方，其他县学的泮池一般都挖掘在棂星门之内，余姚学宫的泮池却挖掘在大门外通衢——学弄之南侧，气势恢宏。泮池之南的空阔地，即成了学宫的射圃。射圃是学子习射之场所。泮池东西两侧建有射圃桥。

学弄之东端跨石巍江建棂星桥，俗称明星桥，为单孔陡拱石桥，宋元丰元年（1078）始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建，桥西端建有一牌坊。学弄西端至南雷路交会处，亦建一牌坊。

在学宫大门前的东西两侧，学弄路中建有木栅栏的辕门，平时关闭不通行，只遇学宫有重要大事时才予以开放。平常日子，行人只得跨越东西射圃桥绕过泮池而通行。

过东侧射圃桥可以直接进入学宫东轴线的崇圣宫，即祭祀先圣先师孔子的地方。崇圣宫后即是训导署和教谕署，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教务长办公场所。再后面即是生员住宿的学舍。

木栅栏之间的路北侧，登上石阶梯即是明伦坊石牌坊。过了牌坊即是棂星门。棂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古人认为它“主得土之庆”。古代祭天，先要祭祀灵星。孔庙设门名灵星，是说尊孔如同尊天。棂星门四楹三间，石柱石梁，石柱顶雕琢祥云花纹。额枋上雕火焰宝珠，明间由一大整块石板组成额坊，刻“棂星门”三个大字，四周刻绦环花纹。

棂星门后，穿过儒学门，即一大天井，过天井即为孔庙第一进“大成门”。“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达到了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大成门五间，碧瓦歇山顶，四周是否黄墙皮，前后各有石阶上下。由门洞内望，令人有深邃莫测之感。

大成门南侧廊下有十几座大石碑。碑石均宽近1米、高1.9米上下、厚0.18米左右。每座石碑多以似龟非龟的动物为趺，名曰赑屃（bì xì）。据说龙生九子，各有所能，九子之一的赑屃擅长负重，故用以驮碑。民间不知，误称之为石乌龟。

经过大成门，豁然开朗，偌大一个庭院，迎面即是大成殿，四周有雕刻玲珑的石栏。

大成殿是学宫的主要殿宇，建筑在双层石栏的台基上，突兀凌空，双重飞檐中海蓝色的竖匾上，贴金的群龙团护着3个金色大字“大成殿”。殿前楹柱各有对联。大成殿高20多米，阔40多米，深20多米，重檐九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结构简洁整齐，重檐飞翘，斗拱交错，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藻井枋檩饰以云龙图案，金箔贴裹，祥云缭绕，群龙竞飞。四周廊下环立石柱，承以重层宝装覆莲柱础。大成殿的建筑艺术，充分显示了

浙东地区工匠的技艺和智慧。

大成殿内正中上方悬挂“万世师表”和“斯文在兹”匾额；正中石基座高2米左右，座上设木质贴金神龛，施十三踩斗拱，龛前两柱各雕一条降龙，绕柱盘旋，姿态生动，雕刻玲珑，异常精美。龛内供奉孔子塑像，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天子礼制。两侧为四配，东位西向的是复圣颜回和述圣孔伋，西位东向的是宗圣曾参和亚圣孟轲。再外为十二哲，东位西向的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西位东向的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四配和十二哲塑像均头戴九旒冠，身穿九章服，手执躬圭，一如古代上公礼制。塑像都置于石基座上的神龛内，四配及十二哲每两位一龛，各施九踩斗拱。龛前有供桌、香案，摆满祭祀时使用的筮、豆、爵等礼器。殿内还陈列着祭祀孔子时中和韶乐乐器和舞具。

大成殿东西两侧有“两庑”，庑内排列着制作精湛的木质神龛，是后世供奉配享的先贤先儒之地。这配享的贤儒大都是后世儒家学派中著名的人物，如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等。在唐代时仅有20余人，经过历代增添更换，到民国时，多达156人。这些配享的人唐宋时为画像，元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一律改为写有名字的木质牌位，供奉在一长排的神龛中。

大成殿之后，经越龙门坊，即学宫的第三进院——明伦堂，又称彝伦堂，为正房五楹，左右还有耳房。它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的场所，是强化儒学的君臣、父子、尊卑等人伦关系的殿堂，是向生员传授儒学伦理道德的讲堂。

明伦堂之后，即庭院北端是尊经阁，它是学宫的藏书楼，“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凡是古代教育所需之书籍，应有尽有。尊经阁为黄瓦歇山顶，三重飞檐，四层斗拱。内部两层，中夹暗层，层叠式构架，底层木柱上施斗拱，斗拱上再立上层木柱。尊经阁结构合理，坚固异常。

明伦堂的东侧有矮墙分隔，过墙即是东轴线上的训导署、教谕署及生员住宿的学舍，有门相通。

在学宫的西轴线上，有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三祠。

名宦祠，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知县顾存仁为纪念历代政绩显著、造福当地百姓的地方长官，发起建造名宦祠。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进行重修。名宦祠最初只是祭祀自汉代东吴的余姚长朱然、朱桓，至明代的邱养浩、马从龙等余姚县历任地方长官23人。至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鹿嗣宗编《余姚圣庙志》时，又补祀了自东吴的吴岱起，至清代的胥庭清、康如连等52人。

乡贤祠在名宦祠的后面，始建年份不可考。后由明代正德二年（1507）知县顾纶重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再次重建，有享堂3间。入选乡贤祠祭祀的先贤有118人，从汉代的严光，到清代的邹景从。清代鹿嗣宗编写《余姚圣庙志》时又补充孙应奎、黄宗羲、高士奇等25人，共达143人。每年春秋两季，余姚知县率领县衙官吏、学子、乡绅，前往乡贤祠举行祭祀大典，号召后人向先贤学习。

忠义祠，为纪念明末清初在抗清复明战争中牺牲的余姚民族志士（时称忠义之士）而建。清雍正五年（1727），由余姚知县叶煊文接上司文书，始建“忠义祠”于学宫东侧。乾隆三十九年（1774）进行修整。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知县涂日耀又把忠义祠移建至名宦祠和乡贤祠旁。从此三祠连栋相邻，与文庙、学宫毗连。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鹿嗣宗编写《余姚圣庙志》，详尽地描述了余姚学宫的情况和形制，实属全国各县学宫之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学宫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学宫的西轴线部分，在民国时期一度成为学宫小学，西邻康节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宫被粮食部门占用，成为粮库，后改为“学弄粮站”。当时尚留存的宏伟建筑和精美石阶、石栏、石狮、石龟仍可让人想象昔日的辉煌。20世纪60—90年代，因旧城改造，学宫建筑被先

后拆除，逐渐毁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巍星路填河扩路，遂将棖星桥移至龙泉山北麓做旱桥保存。1995年，学官的最后一幢建筑——东轴线上的五开间文昌阁被拆除，迁建到化安山黄尊素、黄宗羲墓前，利用旧材料改建成为现在的“龙虎草堂”，布置有黄宗羲生平事迹陈列。

余姚学宫为“文献名邦”余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使“姚江人物甲天下”。自南宋至清代，余姚考中进士的达600多人，有状元5人。其中仅明代，余姚中进士387人，其中状元3人，官至大学士（阁老）3人，被朝廷特征107人，其中大多是由学宫培养出来的。正如明代绍兴人张岱所言：“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

通济桥与舜江楼

在余姚城区中心的姚江上，凌空横跨着一座三孔石桥，连接着南北两城，这就是通济桥，又称舜江桥，俗称虹（读jiàng）桥。

北宋庆历八年（1048），余姚县令谢景初在此始建木桥，取名德惠桥，沟通了姚江两岸的交通。因木材易坏，此后常毁常建，崇宁五年（1106），桥毁，邑人莫若鼎集资复建。时至两宋之际，建炎三年（1129），金兵为追索康王赵构至余姚，曾将此桥烧毁。南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县令苏忠规重建。淳熙五年（1178）毁，淳熙七年，由司业王逯募款重建。至咸淳三年（1267）桥坏，邑人王籍、王应龙等即时复建，改称虹桥。到宋晚期的德祐二年（1276），宋将张世杰率军到姚，为阻止元军的尾追，将桥烧毁。自后暂时改建为浮桥，以便利交通而已。到了元代中期，有僧惠兴愿以庙产做建桥经费，请求改筑石桥。桥未成而惠兴积劳去世，后由道士李道宁继之，到元至顺三年（1332）竣工，下设三洞，定名为通济桥。当时，在整个浙东地区尚无如此大跨度的拱形大石桥，故称之为“浙东第一桥”，并镌刻于桥东侧顶部。据《建桥碑记》所说：“海舶过而风帆不解。”可见此桥之高大。自改建成石桥上，稳固不坏，仅于明万历九年（1581）对南洞做过大修。

乾隆三十八年（1773），知县程明憐见商家占据桥上设摊，考虑到此桥乃南北交通要道，特立《永禁虹桥设市廛记》碑，以利百姓通行。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桥栏石柱上的石狮子被敲凿毁坏，石桥疮痍满目。

跨越通济桥，往北沿石级而下，迎面便是一座高耸的城楼，飞檐翘角，古朴庄重，这就是舜江楼，俗称鼓楼。它与通济桥构成了一个“长虹腾空，飞阁镇流”的联合体。古人有诗曰：“鲸重一击镇海东，下视长江如伏龙。”“山郭遗风忆有虞，江楼落日渺苍梧。”描绘了通济桥和舜江

楼的巍巍雄姿。

原先，鼓楼的西侧有城门，名为齐政门，行人由此进出北城。正对通济桥的城楼上原是承宣亭。元代至元元年（1335），叶恒任余姚州判，正遇承宣亭发生火灾，即将该址改作为谯门，城上建谯楼，制作刻漏（用桶盛水，中置标尺，水滴下漏，按水位来记时的一种古代计时器），非常精确。入夜后的酉时（17时至19时）开始，至次日的卯时（5时至7时），即有楼上值班人撞钟报时辰，击鼓报时刻，即民间俗称的“打更”，向全城报告时辰。

明代嘉靖年间（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倭寇多次入侵余姚，姚江两岸深遭倭患之苦，即于舜江楼上设置钟、鼓、云版，每逢倭寇入侵的非常时期，即鸣钟报警，军民上城防守，以舜江楼为制高点，凭鼓声指挥战斗。城上守兵用强弩利箭，射向姚江中的倭船，杀伤倭寇，把倭寇打退。获胜后即敲动云板，奏起得胜乐曲，给人们传送胜利的喜讯。

舜江楼历经明、清，在万历、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均因灾毁而多次重建。清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39—1841），即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列强曾3次驾船沿姚江西上，入侵余姚。道光二十一年冬，英军兵轮经定海再次驶入姚江抵达姚城，余姚知县彭松年弃城潜逃，英军便登岸抢掠，烧毁天后宫、岳庙、龙泉寺、接待寺、玉皇殿，抢走财物，捣毁神像，同时抢走舜江楼的大铜钟，楼亦被烧。待战事平息后，新任知县林朝聘募集资金予以重建。光绪十一年（1885），舜江楼因火灾焚毁而重建，形式为歇山重檐楼，梁架结构，下层四周为廊，通面阔13.3米，进深6.9米。重新铸造大铜钟，仍做报时和火灾报警之用。民国期间，为开发沿姚江北岸商贸经济，1930年拆除北城东起和鸣桥、西至牌轩下的一段滨江城墙，在城墙原基之上建造商店用房，开辟成沿江街道，并且特别保留舜江楼，作为姚城的景点。

民国十八年（1929）4月18日，县衙西侧的虞宦街发生大火，火势凶猛，焚烧一整天，共烧毁店房百余间。火灾后，余姚县知事苗启平极为震

惊，即时与商家协议，募集资金，调拨款项，尽速重建街区。重建后，改街名为新建路。同时，鉴于火灾的预防，为开阔视野，特于鼓楼的2楼中间加建一座小角楼，提升瞭望视角。小角楼四面开敞，中间悬挂大铜钟，每天日夜有人在小角楼上值班，观察瞭望姚城四周火情。一旦观察到火灾情景，即时撞响铜钟，告诫居民人等，主要还是用钟声告诉四散家居的义务救火队员，赶紧到救火会集合，以便出发救火。当时姚城内即有鼓楼东侧、通济桥南侧、桐江桥东侧3处救火会，救火设备比较齐全。

20世纪50年代，余姚城区的3个救火会组合成为余姚消防队，驻地在鼓楼东侧的楼下，鼓楼上的小角楼即由消防队负责管理，作为火灾观察的哨所。在笔者儿童时期，往往在深夜时分，尚可听到鼓楼报告火警的钟声，为不知道发生在何处的火灾家庭担惊受怕。60年代末，消防队搬迁，火灾报警用的大铜钟移交给龙泉寺保管，鼓楼也就此完成了历史使命。1974年，鼓楼成了水上派出所用房，对鼓楼进行修整时，拆除了上面的小角楼，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81年，通济桥和舜江楼同被列为余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县公安局组成县联防队，鼓楼成了联防队办公室。1984年2月25日凌晨，一虞姓精神病患者潜入楼中，浇洒汽油，点火将鼓楼烧毁。事后即时按原样重建，于年底竣工。重建后的鼓楼，即改由余姚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管理。

姚城牌坊知见录

牌轩，或牌坊，是旧时代为表彰功德科第、忠孝节义等所建立的建筑物。在余姚的历史上，因余姚风水佳美，为居家宝地，无须佛塔镇妖，故此境内从不建塔，唯独多牌轩牌坊，这大概与余姚为“文献名邦”、科第领先有关，姚江两岸名人辈出，科甲联袂，称得上人文之渊藪。

牌轩与牌坊有着显著的区别，按建造形式来分，牌轩的顶部有“楼”的构造，即斗拱和屋顶（雨棚），建造比较繁复，造价也较高，称之为牌楼；没有斗拱和屋顶（雨棚）而只有冲天立柱，立柱之间加横额，建造也较为简单，造价较低，称之为牌坊。城内多牌轩，乡间多牌坊，这即是由建造的难易和费用的多少所决定的。

为什么要建立牌轩牌坊，这得从牌轩牌坊的由来说起。

轩坊是由棂星门演变而来的，开始用于祭天、祀孔。棂星原作灵星，灵星即天田星，为祈求丰年，汉高祖规定祭天先祭灵星。宋代则用祭天的礼仪来尊重孔子，后来又改灵星为棂星。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不仅置于郊坛、孔庙，以及用于宫殿、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及园林前和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景观性也很强，起到点题、框景、借景等效果。

关于“衡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最早记载是《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大概在春秋中叶就已经出现，这是一种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后来，就在“衡门”下方的柱侧安装可开合的门扇，就成为后来被运用到城市中各个居民区之间的“坊门”。从春秋战国至唐代，我国城市居民区都采用里坊闾制，坊闾之间一般有墙相隔，设有门称为闾门或坊门。于是多数人认为牌坊就是“衡门”的变形，它可能与表闾和闾阅相关。表闾之“闾”是闾

门的意思，周代时曾经将皇城以外百姓居住的地方称作闾里，闾里四周用围墙分隔开来，闾便成了里巷的大门。如果在这闾里中出了特殊人物，或是有人做了善行，政府便将褒扬的榜文或牌匾悬表于闾门的横木之上，表示礼贤的敬意，久而久之，表闾逐渐演变成旌表制度。

过去还有闾阅，本是门前立两根木柱子，左边的称作“闾”，右边的称作“阅”。为了显耀祖先与宗族的功业，后人便将祖先的业绩记录在这两根柱子上。由此，闾阅被视为世代因袭的家族地位的标志，显示着家族的尊贵和等级，演化出标榜荣耀、彰显家世的功用，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光宗耀祖”。

表闾和闾阅，一个是“匾表其门”的横木，一个是记功的两立柱，组合起来恰好是后来牌坊的基本造型。

时至汉代，继承周代的闾里制度，将城市分为大小不同的方格，出现了里坊制。坊的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坊的四面各开一门。坊门，就是在两根立柱上面横设牌匾，匾上书写坊名，表示里坊之间空间的分隔，每个里坊都是相对独立的封闭整体。比如唐长安城，城区分为108个里坊；宋代和元代时的余姚，当时仅有的江北城内设有10坊，各坊四面开坊门，即有40座坊门。若某坊内的坊民在科举、伦理道德上有什么业绩，政府就会在坊门表彰嘉奖。年深日久，一座坊门，将门、表闾、闾阅的数种职能统统结合起来，日益显赫起来。

时至宋代，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商业活动活跃，坊内向坊外“侵街”现象时有发生，于是里坊之间的隔墙逐渐被摧毁，封闭的里坊代之以开放的街巷。坊墙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坊门。为便于自由活动，人们就进而将无用的门扇拆卸下来，仅留下框架。于是，一种无墙体相连、跨街独立、自成一体的建筑诞生了，它就是牌坊。经由这一过程，牌坊完成了它的“进化”。

在后世漫长的发展中，牌坊逐渐演变成标志性建筑。整个中国，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便有牌坊。竖立在市井街巷中，标示不同的城市区域：

竖立在宗庙与陵墓前，传递着灵魂与天相通的祈愿；竖立在宫廷衙署前，标示主人的贵重身份；竖立在贞节祠堂前，慨叹着被旌表赞扬的生与死……

旧时中国，各县城乡之间均建竖有众多牌坊。据载，位处新安江上游的千岛湖蓄水后淹没了265座牌坊；目前有摄影师潜入水底，灯光所到，湖底隐藏的牌坊渐渐显形。去过安徽古村落旅游的人尚可见到残留至今的不少旧时牌坊，如在影视中经常出现的歙县斗山街上的许国大学士坊，俗称八脚牌楼，矗立于古城中心，跨街而立；棠樾村有连续7座的古牌坊群；龙川有胡宗宪的尚书牌轩；等等。

建竖牌坊需要得到皇帝的允准。牌坊按级别由高到低分为：御制、恩荣、圣旨、敕建。“御制”由皇帝下旨，“恩荣”是有功臣民或有显著事迹者提出建立牌坊的，“圣旨”即皇帝下旨批准建竖，“敕建”是指皇帝口批恩准。后3种牌坊均为自筹经费筹建，唯“御制”牌坊由户部拨款。

清代《礼部则例》规定：节妇，即“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以及为夫守贞的“未婚贞女”。每年地方绅耆、族长、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并由官府发给30两“坊银”，由本家建坊。

“只要铜钱多，牌轩扛过河”，这是余姚人的一句老话。“姚江人物甲天下”，科第联袂，名列前茅，状元会魁超越他县，贞孝烈女名列青史，故此旧时的余姚城区内有着极多的牌轩，少说也得有70座牌轩，这是余姚人为祖国的历史文化所做出的极大贡献的标志。至今尚留有与牌坊相关的不少地名。可惜的是，在现时的余姚，已经找不到一座完整的旧牌轩了，它们大多是1949年后为利用牌轩石料搞水利建设而拆毁。例如，原南城的新西门外有护城河，南连南明桥，往北经新西门前再沿城墙脚流向姚江。新西门外有桥，桥之北二十几米处有岔口，一条小河往西流约百米转南流向下菱池。当时这条小河的两侧全是农田，属于上菱村、下菱村、仓

前村、城内十三村少数农户。在这护城河与小河的交叉口处有一座平桥（约处现在世纪名苑东大门位置），约在1952年时，桥西侧新建一座闸门，4块水泥闸门板用来蓄水，水闸两端的闸门柱，有2米多长、40厘米见方，即是利用牌轩立柱石料加凿闸板槽而成。利用牌轩立柱石料做成的水闸虽已不存，但是让人记忆犹新。联想到全县各村所建小水闸不会是少数，大多数即利用旧石料加水泥而成，其中有不少是利用墓葬石料所建成。利用牌轩石料也并非个例，只是不会很多而已。

笔者出生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年尚是无记忆的儿童，古时牌轩未曾全见，即使见过的至今亦有不少已经忘却了，实在难以记全。现凭记忆加以文献之考索，特将先前存在过的牌轩，罗列于下，以供同人们茶余之笑谈：

龙泉山南坡原来的上山正路，即现在龙泉寺东侧的石阶路（近年来成了断头路）上方，原有谢迁太傅祠，太傅祠前为谢志望的褒忠祠，祠前竖有先后相连的3座石牌轩，分别表彰谢迁阁老和他的长玄孙、抗倭志士谢志望。

龙泉山东麓，鹅行街与逊埭桥路（现作逊埭路）的交会处，原称邓家巷口，为毛氏所世居，有一座跨路的单门双柱牌轩，不知毁于何时，笔者仅见两根石柱。

临近的城外，接官亭东侧，面对姚江，原有一座极壮观的“世显”牌轩，由丞相史弥远为大理寺正卿毛遇顺所建，“世显”二字即史弥远所书。毛遇顺是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官至两淮制置使晋大理卿。约于20世纪30年代江北旧城拆掉时被毁，留下了“牌轩下”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龙泉山南麓的逊埭路上有邹氏贞节牌坊，双柱单门东西向，约于20世纪50年代毁损了雨棚；往西约5米，即有邹孝子牌坊，亦双柱单门东西向，整体完整，约于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

龙泉山西麓武安王庙前（俗称关帝庙，现文物保护管理所位置）有韩

应龙的状元牌轩，于抗日战争时期拆除余姚城墙的同时被拆掉。韩应龙是余姚菁江渡人，出生于城内笋行弄玉兰堂，明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状元。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全国共录取进士325名，余姚县考取17人，占全国的5.2%。17人中更有头名状元、第二名榜眼（孙陞）、会魁（会试第三名诸燮），同为余姚人所得，一时名震天下，可见余姚人之了得。孙陞的榜眼牌轩和诸燮的会魁牌轩亦分别建竖在孙家境和第四门（泗门）。

阳明东路（原柴行街）秘图山后王家宗祠前有面朝南的“新建伯”石牌轩，四柱三门，于明嘉靖十六年由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周汝员、绍兴知府汤绍恩、余姚知县顾承芳等发起捐建。1965年1月，由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运动在全国开展，教育部门认为破旧的“新建伯”石牌轩与学校环境格局不相衬，令学校拆毁，4只石狮子即就地掩埋，拆下的牌轩顶部雨棚、4根立柱等是上好石料，即由柴行街小学卖给久丰纱厂作为建墙基的石料；刻有“新建伯”字样的上额和“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的下额后来经过周折被追回，两匾额中间已断开，就一直保存在学校操场西边。时至2005年，牌轩被重新建竖于王阳明故居瑞云楼前，牌轩中间写有“新建伯”大字的轩额即是旧牌轩原物，而那块下额已不知去向，只好按照照片原样重新书写凿刻。

现在的阳明东路上，即桐江桥之东，东过银锁桥、金锁桥、秘图桥，与合宝弄交会处亦有一座牌轩，不知名，也不知毁于何时。

县东街，包括原北段的中山弄，全长300米的这段路上，南北共有4座牌轩，双柱单门，不知名；路之中段西侧即为城隍庙大门，朝东的大门前原有一座四柱三门、工艺精湛的石牌轩，约毁于20世纪60年代。城隍庙头门于20世纪80年代迁建到龙泉山上中天阁西侧。

由县东街转东向，到都司前（工人路）与莫弄（后改为木弄，现合宝弄）交叉处有一座牌坊，20世纪50年代时，牌坊整体尚完整无缺，四柱三门，上有雨棚，下有石狮，至20世纪70年代消失不存。

出北城的东城门，过澄清石拱桥，至高阶沿路东首的方井头，原有翁

大立的尚书第，府第前原有翁尚书牌轩。翁大立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进士，精于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淮河有功，迁任工部侍郎，最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他与戚继光极为友好，二人在抗倭战争中互相配合。尚书牌轩不知毁于何时。

过尚书第再往东还有一座木牌坊，但不知为何人何事所建，只是留下一个木笃牌头的地名。

桐江桥之西，智慧桥之南的新街口（现华联大厦之西北，约现爱心献血站位置）有一南北向的牌轩，不知名，笔者尚见牌轩立柱。稍往南转西，原邬家道地东首（现阳明西路，爱心献血站之南），有王阳明之父王华的状元牌轩，东西向，上刻“辛丑科一甲第一名王华”字样，王华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状元。新街口向西，即被称为邬家道地的街弄（现阳明西路），在原邬氏宗祠北侧（邬家道地），方久记洋楼正门稍西有王阳明会魁牌轩，上刻“己未科第二名王守仁”字样，王阳明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科会试时考中五经魁首，称“会魁”。再往西，至大王庙东南角（现武胜门路南端的阳明西路上）有王正思（王守礼之子）的进士牌轩。父、子、侄3座牌轩处在同一路上，王华状元牌轩与王阳明会魁牌轩相距30多米，会魁牌轩与进士牌轩相距近80米，均为双柱单门样式，东西向。王华、王阳明的故居即处于现阳明西路与武胜门路交会处的瑞云楼。状元牌轩、会魁牌轩、进士牌轩均于20世纪60年代拆毁。

姚江北岸仁寿桥之东侧有贞节牌坊，上题“天锡完节”，双柱单门，不知为哪位贞节女子所建，于1997年扩建仁寿桥时拆除，现还残存部分牌坊构件，至今堆放于龙泉山龙泉寺的东侧。

北城老西门外的瓮城中，即六浦桥东坝有牌轩，不知名，尚存有一根轩柱残立于原址。

北城外武胜门桥南北两侧各有一座牌轩，21世纪初南河沿路改造时，还可见桥南桥北两座牌轩的石柱，整体的牌轩毁于20世纪50年代。

候青门外季卫桥北端的候青路上亦有一座石牌轩，为杨氏族人所建，

上刻“祖孙进士”，毁于20世纪50年代。

酱园街东段原四明阁之西，探花墙门临近，有为朱兰所建的探花牌轩，不知毁于何时。朱兰是清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一甲第三名探花，是著名的考试官、安徽学政，甄拔人才，风谊可嘉，最后累官至内阁学士；现迁建至龙泉山西麓的四明阁即是他的藏书楼。

酱园街邬家牌轩，背面额坊刻有“诰赠行人司行人加一级邬恩武，妻诰赠孺人俞氏，子己丑科进士，提督河南学政邬景从立”字样，是清代提督河南学政邬景从为父母亲所立的石牌轩；1998年酱园街工程改造时被发现，已失去上部的雨棚。此坊四柱三间石结构，残高4.5米，额坊上浮雕蝙蝠、梅花鹿、仙鹤等吉祥图案。当时即因酱园街整体改造而拆除。

余姚古有南北双城，挟姚江对峙，上述为江北旧城的牌轩，下面再述江南城的牌轩。

两宋时期，余姚学宫在大黄桥西南，正门处在上寺桥与下寺桥之间，正门前即有棂星门坊，上寺桥和下寺桥圯还各有一座石牌坊。约毁于明代。

原学宫之后的桃李园前有纪念莫子纯的牌坊，早毁。

时至宋熙宁九年（1076），黄铸担任余姚知县时，感到旧学宫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亟须扩建，即于两年后的元丰元年（1078），在现学宫内新建学宫。新建的学宫，豪华壮丽，占地面积大，四周有通道，南面为学弄，东侧为举弄，民间误称为鬼弄；西侧为黉弄，现处实验小学内；北面为醮醮弄，因弄口原有一株极大醮醮花，1949年后改称为杜义弄；学宫正门前，学弄南侧有一个椭圆形的泮池，大门东西两侧立有两块石碑，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军民人等至此下轿下马”的字样。学宫正门前建竖棂星门牌坊，四柱三门，工艺精湛；学弄东西两侧各有牌坊，东边的在棂星桥西圯，西边的临近南雷路，双柱单门。

江南直街北端，西街东首，原怀德堂国药号前有一座牌坊，不知名，毁于20世纪50年代。

桃园弄往东即大黄桥，桥之东有史家埠头，此位置的城墙内有一座牌轩，嘉靖十九年（1540）为旌表史鸾之妻陈氏贞洁而建；再往东，在羊淘埠头位置，有一座节孝牌坊，不知为谁而建。两牌坊均毁于20世纪60年代。

笋行弄内双眼井附近有绣衣牌轩，即现在称作绣衣坊的地方，四柱三门。按：汉武帝时曾派遣御史穿绣衣、持斧仗节，领兵出巡处事，后世遂将御史称之为绣衣御史。此牌坊应为任职御史的人所建竖。早毁，20世纪50年代尚见残存的石柱。

南城新西门瓮城内有一座石轩，四柱三门，虽在笔者旧宅附近，可惜笔者童年时仅见牌轩石柱尚在，已不见牌轩上部。

巍星路东的东朝街靠近莫家弄口处有邵晋涵的会元牌轩，早毁。

石巍桥之西的贞节祠前有贞节牌轩，表彰姜荣之妾窈妙善为保护丈夫任职的江西瑞州郡印，以一死洁身。该牌轩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四柱三门。毁于20世纪50年代。

现在的保庆东路原叫东天宫，有保庆宁邦王庙，庙前有石牌轩，早毁。

原庆西路原叫江南柴行街，在五板桥旁吕阁老宰辅第两侧有两座牌轩，早毁。

南城棂星桥之东的东朝街上有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一甲第二名诸重光的榜眼坊，早毁。再往东几十步，即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一甲第二名邵瑛的榜眼坊，亦早毁。

南明门内的清河桥旁原有石牌坊一座，笔者曾见过毁后留存的牌坊柱子，不知何名，也不知毁于何时。

城南门外百步，约最良桥附近有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前有工艺精美的四柱三门牌轩一座，早毁。

谏议牌轩，在南城外的史家村它山庙旁，明代浙江巡抚常居建于万历二十年（1592）春，为明代正德年间兵科给事中史立模、嘉靖年间平阳县同知史自上、万历年间江西按察司佥事史元熙3人而建立，南北朝向，四柱

三间，顶上雨棚于20世纪90年代塌毁不存。2020年年末，于此新建档案馆大楼的同时，遂在原址修复该牌轩。

现称南庙之地，为原南雷瑞应王庙所在，庙前原有一座四柱三门牌轩。为清同治四年（1865）重建，毁于20世纪50年代。

至于各乡镇间的牌坊，数量众多，由于没有文献载录，实在难以查核考见，现仅按所知的牌坊做一些记录。

低塘街道下河严家村有纪念严子陵的“高风千古”牌轩，据说始建于东汉建武十八年（42），汉光武帝刘秀为牌坊御赐“高风千古，清节流芳”8字，赞扬严子陵一生笑傲名利、清身全行的品德。宋文学家范仲淹有诗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存牌坊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原址重建而成，体现了明代特色，仅存四柱三门格局，顶上的雨棚全塌毁不存，是余姚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牌轩附近，原有严氏宗祠，格局完整，毁于20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重建。

泗门镇内牌坊较多，有13座。汝仇湖东岸鸾桥头边的大道上有谢迁的状元牌轩、谢丕的探花牌轩；在阁老府路上有柱国牌轩、节孝流芳牌轩，都是双柱单门；在后塘河谢氏宗祠前，原有“东山并秀”“太傅流芳”两石牌轩；还有诸夔的会魁牌轩。泗门镇内的牌轩均毁于1965年，因为当时全国开展“破旧立新”运动，而破旧的石牌轩与新格局不相衬，即予以拆毁，时有泗门镇一位副镇长是大隐石匠出身，处理石牌轩很是内行，即由他指挥众人拉倒牌轩，石料用作泗门大会堂的建筑石材。

梁弄姚巷有方山京状元牌坊，双柱单门，毁于20世纪60年代。梁弄狮子山旁有“丹山赤水洞天第九”坊，唐天宝三载（744），朝廷遣使进四明山祷祠，钦差大人害怕山路险远，不敢过羊额岭，即命道士崔衍移建于此，毁于20世纪60年代。兰塘有表彰冯兰的牌坊。孙家境有表彰忠烈公孙燧、嘉靖十四年（1535）榜眼孙陞等的牌坊。在朗霞塘堰桥与八字桥之间，有座较完整的四柱三门“节孝坊”，毁于20世纪50年代；在周东严家，有座无顶部雨棚的四柱三门牌轩，顶部雨棚在20世纪60年代被龙卷风

卷到杭州湾北沿，有人在那里见过。

历山村之东南，洋山之南的牌轩头村，村中有明代邹儒、邹轩“父子进士”牌轩，亦毁于20世纪60年代。

在冯村的清贤岭下，原有一座石牌坊，牌面上写有“清水门”3个篆体字，牌坊遗存有二根石柱，上边还刻有楹联。

陆埠袁马村西庙前有碑轩，东面题“符合”，西面题“刺史”，为袁伯岩所立。袁炜墓前有牌坊，题“皇明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少师谥文荣公神道”；在丈亭也有为袁炜所立碑轩，前题“首登元辅”，后题“连擢巍科”。

河姆渡北岸浪墅桥钱氏牌楼下有座“两代完贞”牌轩。《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坊表”载：“县西南三十五里，黄墓渡北，为国朝钱学曾妻袁氏钱世泽妻孙氏立。”又，《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七列女传三：钱学曾妻袁氏，子世泽妻孙氏。袁归学曾，结缡三载，生世泽。未几，学曾以瘵亡。袁事迈姑，抚幼子，孝慈周至。比世泽长，为娶孙氏。甫二载，生子大坤，世泽又亡，袁号痛几绝，孙曰：“吾姑清节，天人共鉴，今有一孙，是天不绝钱氏也！愿终守，以期吾子之成立。”姑感其诚，遂相守以至于老。袁歿年七十八，孙歿年六十八。道光十二年（1832）大坤为祖母、母请两代旌，建坊于黄墓渡。20世纪60年代拆圮，石料用于水利工程。

魏家桥村里原有几座牌坊，村口路东路旁有节孝坊，“嘉庆十七年为魏鉴妻叶氏立”，由时任浙江巡抚高杞手书的“旌表清故儒士魏鉴之妻……钦命浙江巡抚部院……嘉庆十七年季冬月”，背刻“千古流芳”；魏家村西“花门头”门前路上有绣衣坊，为明御史魏英立；还有“解元”坊，由知县贾爽在其家乡为“明天顺间魏法中京闱第一名立”。贾爽，巴县人，景泰甲戌进士，天顺二至五年（1458—1461）任慈溪令，后官至副都御史。

姚西芝山东北3公里处，龙王塘山西侧四公里有个河里毛家，历史上出

过较多的名人，如追谥“忠襄”的广东按察使毛吉，贵州按察司副使毛科等。河里毛家旧有毛氏宗祠，门前原有一座牌坊，1956年8月1日，13号台风袭击余姚，这座牌坊即被台风所吹倒。

姚北的眉山司城（在今朗霞新新村）大古塘上有一座“钦旌孝子赠工部主事桑天显”的牌坊，匾额书“劬躬铸后”，不知毁于何时；有“钦旌为已故国学生桑洪行之妻谢氏立”的节孝坊，现已不存。还有明代正德十一年（1516）浙江乡试解元、后官至广东左参政张怀的解元牌坊。眉山东麓还有明正德年间南京工部尚书陈雍的牌坊，此坊为陈雍年90岁时由朝廷赐建，题额“德寿”。约毁于20世纪70年代。西郑巷原有一座节孝坊，不知毁于何时，现于原址重建了新坊，书写格式改成新式的，柱联的上下联也弄错，失去了古韵与历史的价值。

临山之北的庙山东麓有姚娘庙，庙前有姚娘的牌坊，庙与牌坊均毁于清代。

姚江驿

余姚古城之东临，沿姚江往东是一条沿河古街，因这里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众多酱油作坊，于清代乾隆元年（1736）始，又先后形成致和、鼎和、具美3家酱油大作坊，故名“酱园街”。就在酱园街上，往东行约200米，即有一处古驿“姚江驿”遗址。姚江驿，就是余姚的驿站。驿前原是一条卵石嵌铺的官道，想当年，官道上蹄声嘚嘚，敲打着卵石路面，行人、挑夫、车轿、骡马，来来往往，商贾云集。路的南面，姚江水波清澈，沙鸥低飞，帆影参差，百舸争流。沿江码头罗列，官船商舟辐辏，有的在靠埠停泊，有的在拔篙起航。长短交错的船篙，浸透了江水和船夫的汗水；笨重而泥滑的跳板，印下了挑夫驿卒的脚印。这里送走了无数赴任或卸任的官员与将军，迎来了众多的学士与墨客，传递着无数的军报与文书。

在中国历史上，早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在各地设置邮驿，《孟子·公孙丑上》曾说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按：“置、邮、传、驿”四字同义。秦汉时期设驿骑，各地设置传舍，以供歇宿。到唐代，更于水路增设水驿。宋时设邮铺、马递铺。元代称“站赤”，亦即驿站，规模比宋时要大得多。明代改称马驿、水驿、递运所，递运所专门负责运送官物；又另置急递铺。需用马驴、车船、人夫、杂物等项各有定额。清代废递运所，仍置驿站、铺递，官物的运送归之驿站。凡驿站传递均以邮符、勘合、火票验证，定其迟速之限，计以时日。驿传人员凡擅发牌票，索取夫马者，不准应付。违者，与受者同罪。如挟带私物，由地方官验实，申报究处。奉差官役不遵勘合、火票填注，枉道扰驿者，是官者降二级调用，是杂役者杖一百。驿传道私发牌票，违例支取夫马者革职。

清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驿站事宜辖隶于兵部车驾司，地方由按察司或道员具体负责。乾隆五十年以后，各省驿站隶属于厅、州、县。自

从将驿丞由从九品改为未入流之后，钱粮夫马归掌印官管理，以府道掌稽察，由按察司兼驿传事务总核一切，驿丞只负责驿馆事务而已。乾隆五十三年，上谕：“嗣后督抚、提政及学政等，凡遇出考途次所需夫马等项，均著自行备用，毋得令经过各员代办。并令文武互相纠察，如有仍前需索扰累者，即行据实参奏，从重治罪。”乾隆五十五年又发上谕：“嗣后各省督抚等，如非紧要事务，俱不准滥用驿递。倘不知轻重缓急，仍沿故习，必治以应得之罪。”清代，朝廷寄发的公文，在封套背面均贴有“×百里驰发”表明速度级别的“排单”（行程单）。公文沿途所经驿站均须在“排单”上签注收发时日，以保证公文限期送达及备查误期责任。直至清末举办邮局后，自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一起，各省驿站事宜由邮传部接收，以统一交通行政，驿站自此废止。

驿站为官方所设置，和民间自行设置的驿亭有别。但路过官员赶不上驿站时，亦可在驿亭歇宿，而驿站一般不接待普通商旅。驿站由驿丞掌管，属从九品衔，至清代才改为未入流。明正德初，余姚的王阳明先生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权宦陷害，充军贵州龙场驿时也曾担任3年之久的龙场驿驿丞。在民间，对驿站服务的人员统称为驿卒，亦可称为铺兵或驿夫。

余姚历来为浙东交通要口，往来官员频繁，文书传递频仍，特设置驿站。时间大约始于唐代，于县署北1里（约500米处）置“待宾馆”。在尚无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姚江是浙东境内的主要交通线。到宋代，因姚江水陆交通日趋发达，特建姚江驿于县治东门外姚江北岸，即今酱园街中段。驿中有马20匹、船20只。步出北城东城门澄清门，折南经东横街，迎面即是姚江之滨，姚江驿即坐落于此。姚江驿的左右，店铺林立，客商摩肩；岸上人声喧哗，江中舟船穿梭，市面极为闹猛。在缺少公路汽车交通的当时，水运驿站曾独领风骚，这里的船埠头就成了余姚对外交往的枢纽。回想当年，姚江驿四周人头簇簇，姚江碧波如蓝，面对此情此景，身坐茶馆酒楼，一杯茶一壶酒，何等优哉游哉！元代，改称余姚驿。到明代

时，复称姚江驿。明清时，姚江驿有驿丞1人，吏1人，馆夫8人，正副铺陈16床，陆夫18人，看管杂物夫8人，站船20艘，水夫67人，马20匹。按朝廷规定，凡浙江境内的驿站用船，每3年小修，每6年大修，每10年拆造。

由于年代久远，岁月侵圯，至明代嘉靖中期，姚江驿予以大修，重建大门3间，仪门5间，厅屋5间，川堂1间，后寝5间，池亭3间，左右廊房各10间。到明崇祯八年（1635），上虞县令会同余姚县令，欲将姚江驿移置到坝上，省三院（布政司使、按察司使、都指挥司使）已经同意。突有余姚县民徐宗周直赴京城上疏力争，事下省巡抚衙门重新调查处理。时有巡抚衙门推官夏雨金承办，提出旧制不可轻易变易，姚江驿得以不废。而余姚县令朱芾煌为此而调离余姚。时至清顺治年间，上虞人重兴旧议，仍想将姚江驿迁置坝上，有省院委托绍兴知府刘桓审定，姚江驿仍旧不废。到雍正十年（1732），知县张永熹将姚江驿旧址改建为节孝祠，驿废，姚江驿就此完成了历史使命。节孝祠内只保存有姚江驿石牌坊一座而已，时至现代，就连这姚江驿石牌坊也已不存了。风波震撼姚江古驿，时越千年，此地就一直成为余姚的水陆交通要口。

正由于姚江边存在过为时不短的姚江驿，姚城东隅的姚江边就一直成为余姚的水陆交通要地，整个地段日见繁华，人称“东驿下”。驿旁还建有一庙，称东驿庙。庙前即为东码头，来自舟山、宁波、绍兴等地的海船民航，云集于此，客来人往，热闹非凡。清代诗人宋梦良曾有诗云：“东门以外树行街，遍泊宁航向晚开。西上东下都过此，扬帆送往又迎来。”诗中所说“树行街”即今酱园街东段。时至民国初期，这里又成了火轮船码头，在水路作为主要交通运输方式的年代，这里是余姚对外交流的主要港口。

在鸦片战争时期，驿下庙还发生过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清道光十一年（1841）十月，英军再陷定海，转而猛攻镇海招宝山，两江总督裕谦率兵四千守镇海。英军刚到招宝山，守将余步云悬挂白旗，临阵脱逃。督战镇海城头的裕谦，见要塞失陷，事出突然，难以御敌，即跳泮池自杀。被

人救起后，即用船送至绍兴。船经余姚驿下庙时，上岸稍事休息，即气绝于此。裕谦为蒙古镶黄旗人，皇室贵族，平时力主抗英，在镇海城保卫战中，号召全体将士，决不议和，拼死力战，决心与镇海共存亡。

斗转星移，昔日的姚江驿已经不存，昔日在船埠停泊的官商船只也无踪影，迎来的已是另一番风貌。

注：清末举办邮局后，自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一起，各省驿站事宜由邮传部接收，以统一交通行政，驿站自此废止。

姚城祠堂

祠堂，又称宗祠、祖庙、家庙，是一个宗族祭祀先祖、处理族内重要事务的地方。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在姚城内，簪缨之族，官宦相继，大户巨族追尊先祖，故此宗祠众多。由于各宗族大小不一，族产丰简有别，宗祠有的壮观，有的简陋，大小不等。姚城内，历来有史、朱、邵、徐四大家族，官宦显赫，家财雄厚，宗祠建筑恢宏壮丽，祭祀程序繁复。

史氏与宗祠

按《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史氏出自周太史佚之后，子孙以官为姓。”史佚任周朝太史，为人严正。武王克商后，史佚受命与周公、召公、姜公同辅成王，后人并称为“四圣”。史氏为江左望族，自东汉迄清代，历1700余载。溧阳为鼻祖，明州为大宗，姚江为小宗，余姚史氏即以史佚为始祖。宋代时，有鄞县之史浩，于绍兴十五年（1145）任余姚县尉。史浩族人随侍余姚，遂定居于姚城。后史浩入相，加封越王，身威煊赫。史浩之子史弥远（加封会稽郡王）从孙史嵩之先后为相，擅权用事，宠渥至极，故有鄞县史氏二王三相之说，为鄞县望族。余姚史氏为鄞县史氏分支。迁姚史氏始祖史德，南宋宁宗年间（1195—1224）迁徙至余姚。史德，字克明，溧阳三十六世、迁明州七世史弥贤之子。姚城史氏自后逐渐兴旺，成为姚城大族，散居姚城内外各处，至明代时尚有不少人仕途煊赫。

余姚南北两城史氏人口众多，三房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史

珂作于明隆庆五年（1571）的《史氏族谱图引》称：“自宋及元，冠婚丧祭必合族焉，迄今不废。”后来大概随着各房进一步繁衍发展，每当春祭和迁姚始祖史德府君墓祭时，三房子孙即相聚共举。所以，由史节和作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姚江史氏续修宗谱序》说：“三支各建一祠，惟春祭以及浒塘墓祭合族焉。故流则厘而为三，源则合而为一。”

史氏宗祠位于义井巷弄中段的路南，正门朝东，祠屋坐北朝南，建筑恢宏开阔。宗祠曾经多次修葺，其中较大的几次有史澹园于乾隆年间捐助千金重修，史湛于雍正年间出资修葺，史致昆于咸丰年间捐资邀议修葺。另外，史节和于乾隆年间倡举迁姚始祖史得斋祀产，并促成史乐闲、史追远、史一拙祭产。此后祭产也历有增置。

至清代，史氏开始衰落，仅有城南半霖的史孝咸兄弟，以及太守房路的史梦蛟以廩贡生优叙历官至山西太原知府，因校刻全祖望《鮚埼亭集》而闻名。管家弄和县东街，各为史氏姚城聚居地之一。县东街东侧现存史家大院、史家大厅、史家墙门、史家老宅等居宅，南北相连。史氏宗祠原址，于21世纪初建太平洋大酒店而拆毁。

朱氏与宗祠

朱氏先人在周时封邾，为邾氏。至秦楚之际，改为朱氏。汉时转徙于鲁魏之间。余姚朱氏始祖，据《余姚朱氏宗谱》清同治版记载：“南阳沛国朱氏南迁祖，分徙越州，又始于炜伯谦者，迨明州录事参军瑞府君嫡孙兵部尚书美甫君，分居双雁，为迁姚始祖。”《余姚朱氏宗谱》又载：“宋参军朱瑞，琅玕人，以录事明州，家于鄞，传二世廷碧公，熙宁时拜兵部尚书，致仕来姚，见双雁石仓之美而卜筑，遂世居焉。石仓如冠如珮，因名冠珮里。”朱瑞，琅玕人，朱玉十一世孙，字天锡，生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卒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享年73岁，宋初官明州录事参军，遂家于鄞。生三子：允祥、允迪、允中。次子允迪，字惠吉，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卒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享年72岁，官国子监丞。生二子：廷良、廷碧。

朱廷碧，朱允迪次子，字美甫，号万四，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四月二十二日，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六月初十，享年59岁。官兵部尚书，致仕归，寻幽游胜，见余姚双雁石仓之美，筑室侨寓，遂世居焉，是为迁姚始祖。

按上述谱记，汉代时，朱氏由河南南阳县迁徙到山东琅琊，即今山东诸城县一带。宋时，朱瑞任职于宁波“明州录事”，居鄞州。朱瑞之孙朱廷碧，宋熙宁时（1068—1077）任兵部尚书，致仕后徙居余姚双雁石仓村，山峰有岩崖如冠如珮，因名冠珮里，今属余姚市梨洲街道，朱廷碧遂成为余姚朱姓始祖。

朱廷碧迁居冠珮村后，其后子孙又分批外迁。一支迁入山阴县，一支迁上虞县，有一支迁入余姚城内龙泉山和城东北的梅川乡两地。其中，朱廷碧五世孙朱正秦（1204—1279）被奉为余姚一本堂朱氏始祖。按谱载：朱氏“虽有山阴、余姚、上虞之分，而原其一本，则皆发源于冠珮，而根本于南阳者也”。

朱正秦生有3个儿子，长子端一世居冠珮，次子端二迁居余姚城内龙泉山南麓，后来小儿子端三也迁到龙泉山西麓居住。迁居姚城后，朱氏子孙繁衍，世系分三大支七大房分支，分居于酱园街、城北、丰北等处，成为余姚城内又一大族。从此，余姚朱氏开创了长达900余年的兴旺历史。

至明代，朱氏子孙在龙泉山南麓，绪山庙西侧建造朱氏宗祠，坐南朝北，面对城墙，城墙之南即姚江，前后3进，东西方向延展开阔。朱氏宗祠是姚城内最为开阔的宗祠。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改建为教育局和图书馆。

邵氏与宗祠

邵氏先世为河南范阳人，南宋初，邵康节之孙邵溥随宋高宗南渡，居杭州。至宋理宗时，邵康节第十世孙迁居姚江南岸的通德乡清风里。后来由于人口繁衍，分居之地较多，待构筑江南城之后，南城东朝街至学弄一带为邵姓子孙的主要聚居地。由迁姚一世祖至今已传至第二十九代。

邵氏宗祠在江南学弄，坐落于学宫之右，初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初建时规模较小，到康熙十六年（1677）购买陈氏旧宅扩大规模，前后4进，台门3间，大厅、中楼、后楼各6间开面，后两个天井各有东西侧楼。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行整修，又扩大规模。光绪十四年（1888），由巡抚邵友濂和邵曰濂兄弟出资重修，扩大规模，增建附房，大门前增设木栅栏，照壁移至隔街前，照壁前挖照池，与学宫泮池平行；大门上方悬挂“邵氏宗祠”匾，正厅内悬挂“光裕堂”匾，堂前植有松柏。中楼、后楼和两边厢房置放神主牌位，成为余姚规模最大的祠堂之一，是邵氏宗族祭祀祖宗和处理宗族内部重要事务之地。

邵氏宗祠祭祀所用器具十分讲究，其中一副“五贡”（俗称“五祀”高脚烛台一对、宝瓶一对、香炉一只），用点铜浇铸而成，有一人多高，重达400余斤，为余姚各宗祠之最。邵氏宗祠每年有多次祭祀活动，每逢正月初一、清明节、中秋和冬至四大节日，召集合族人等到宗祠举行祭祀仪式，以正月初一为最隆重。宗祠有解决宗族内重大问题的职能，族内子弟违犯族规，或发生重大纠纷，均在祠堂内由族长主持商议解决。族长是议事的主持者，近房房长和宗室知名人士是协办者，族长权力较大，有最终决定权。邵氏宗祠与其他宗姓祠堂一样制定族规，处理事情以族规为依据。邵氏族规与别的宗姓族规相比，显出比较开明和民主的特色：邵氏族内人遇到事情怕打官司，却愿意进祠堂内解决；姚江邵氏族内族人只有长幼之分，没有嫡庶之别；清季之后，允许女眷参与祭祀活动，在余姚是最早开禁的宗祠。究其原因，邵氏族人在朝为官者多为洋务派人士，接受西学比较早，有改革和改良的思想，嫡庶平等是因为庶出子孙中人才济济，有许多光宗耀祖的人物，有的支派是依靠庶出挽救了断嗣的危机，使宗族再度兴旺。邵氏宗祠在管理上比较公开、公平、民主。宗祠设董事会，管理财产财务和族内公共事务。宗祠的各项财务收支设专人负责，由董事会讨论决定。邵氏宗祠的房屋财产和田产较多，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办祭祀、兴义学、修宗谱等公共活动，与县内其他大族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因

此祭祀活动规模和热闹场面堪称余姚之最。兴办义学也较成功，修宗谱次数也比其他宗姓多，迁徙至外地的姚江邵氏支派往往愿意回籍入谱。

1930年，宗祠旧址创建康节小学，神主牌位仍置于原处，余房均做校舍。

除城区姚江邵氏大宗祠之外，还有两处邵氏分祠。孝义乡分祠，称“孝义家庙”，是世居孝义乡邵巷亚一公支派所建，称“承裕堂”，规模较小，前后共2进，3间开面，门楼之后为正厅，大门悬挂“安乐风范”匾，正厅悬挂“承裕堂”匾，两进间天井东西各有侧楼，西边有一排附房。杭州仁和县塘栖镇分祠，是亚六房之三房迁徙至仁县的分支所建，原建筑规模较大，前后共4进，各为5间开面，坐北朝南临街而建。清道光年间，前两进不慎失火焚毁，正值商议如何进行修复之际，战乱又起，太平军入境，火烧后面两进；两次火焚，宗祠破坏殆尽，只留下断墙残壁一片瓦砾。

徐氏与宗祠

早在6世纪，余姚即建有徐偃王庙，可见这里较早就有徐姓居住，随后不断发展，逐步散布于余姚城乡之间。据南北朝梁天监七年（508）御史中丞王僧孺《修立灵山王庙碑》载：“余姚龙泉山祀立王庙。”（《姚江徐氏宗谱·徐偃王世系事迹》卷二）“名家巨族，无愈徐矣。”（祁世良《姚江徐氏三续增修宗谱·序》）再从现存家谱考索，余姚现有徐氏大多迁于南宋以后，其渊源大都来自徐处仁及其近族。《姚江马堰徐氏宗谱》载：始祖即为南宋初徐处仁，原文曰：“第一世（始祖）处仁府君，藏次子也，字守义，行迁念二，诰赠武节大将军。配王氏宜人，生三子：端一、端二、端三。墓葬海南屿墩山。是公始迁姚江，驻马堰，至今宗庙巍峨，春秋二祭，江南有祠也，姚江亦有祠，二祠之子姓济济无涯矣。”按谱谍考察，来自徐处仁及其近族的徐姓有4支，可分3种情况。一、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马堰徐氏后来分支徙居余姚县城、南城、眉山、周塘、云柯，并各有家谱。二、孝义乡徐氏。始迁祖徐淳四为徐处仁长子徐徽之后

裔，明时自徐官桥徙孝义乡德惠桥。三、茹墟徐氏。始迁祖徐珣三为徐仁处侄孙，南宋时自会稽徐家宅徙居余姚烛溪乡茹墟。

迁姚始祖迁居前历史无从考证的徐氏还有如下3支：一、候青门徐氏，元至元初，始祖徐清一因兵燹战乱，自绍兴府桥徙居余姚冶山；二、菖蒲塘徐氏，南宋绍兴年间有户部侍郎徐泰十，其六世孙徐良三于宋末时自上虞县管溪迁居余姚菖蒲塘，尊徐泰十为始祖；三、梅川徐氏，南宋庆元年间，武昌县尹徐正中迁至余姚城西北隅，再移居姚城东北的梅川乡，尊徐正中为迁姚始祖。

姚江徐氏认为子孙是“吾祖一体而分也”，故而建祠堂以敬祖，举行相关祭祀活动。徐氏宗祠是徐氏子孙祭祀祖宗的重地，“祠门有禁，非祭祀及进神主等礼不擅开。平日从旁耳门出入，或将戒责不肖子孙共告谒祖前始开”（《姚江徐氏续谱·家礼志略》卷七）。“其有两家争斗事，集族，判直者无罪，曲者科罪外，次日更令设祭演剧谢，如抗斥族。”徐氏宗祠是族内举行重大仪式、商议族内重大事项之地，极为严肃。

徐氏宗祠原在学宫后面俗称“大园”的位置，原先的规模陋小，至明代崇祯初，徐行素倡捐，买地于南城阴东南1里，即在姚江南岸，石巍桥之西，即现今的念慈桥南圯，始建走马楼一幢，坐南朝北，为后来大宗祠之发轫。清乾隆十八年（1753），在大门与走马楼之间，“中建巍楼，旁设厢楼，两带上下，共添20余间”（《姚江徐氏续谱·宗事纪实》卷六）。至此，徐氏宗祠形成三进格局。依南城北城墙根竖立旗杆，头门悬“徐氏家庙”匾，为王阳明所书。东西各有耳门、门房一小间，又东小屋二间，小院一方。头门内天井，铺设甬道。第二进前设仪门，仪门紧临中楼，中楼檐下悬“世大夫”匾。楼下为三开间明堂，悬“愿贤”匾。边间开耳门，有梯。楼上四面飞檐，南北开窗，悬“望先楼”匾。楼后辟后天井，铺设甬道，两边有厢楼各3间。第三进檐下悬王阳明所书“雍肃”匾，堂内悬“妥先堂”匾。边房各一间，上为走马楼，供奉列祖神位。边房与厢楼相通。

同治六年（1867），添置祠后土地，6年后增建楼房两进。这样，徐氏宗祠形成5进的格局，寓五行相生之义，成为余姚最大的宗祠之一。其新增两进是：第四进三开间加两旁耳房，堂悬“后先辉映”匾，中设甬道，左右各小院。川堂之上建悬楼，北檐书“陟降在兹”，南檐书“克昌厥后”。耳房左右有梯，南北设窗。第五进共5楹，建在台基之上，屋脊砖雕“光前裕后”。堂前设甬道，两边各大院。拾级以登，进升中堂。中堂内设追远五代祖宗座。左右为侧堂，东西有梯。楼上悬“奉选楼”匾，北面开窗，供十六世以上神位。楼边设八角栏榭，可以瞻望四周。

徐氏宗祠头门内还竖有一块特殊的禁碑，上刻“徐×韩两姓，永世不得婚姻”，并在“徐”“韩”二字之间打上红×，以引起徐姓子弟的警觉与遵守。相传这一块石碑起因于状元韩应龙。韩家贫困，韩应龙向出嫁到徐家的姑母家借银做上京赴考路费，姑母不仅不借，还对韩应龙予以讥刺，并使韩应龙遭受冤屈。后来，韩应龙考中明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状元，冤屈得以昭雪，韩、徐两家由此结下深冤，永不联姻。详情可参阅“姚江文化丛书”《姚江民间故事》中诸焕灿撰《金钗冤》一文。

由于徐姓子孙繁衍，衍生出10个房头，即在西街石子弄内建有“百顺堂”，在江南直街中段老当弄内建有“仁寿堂”，作为徐姓的分祠堂。仁寿堂分祭第一、二、五、八、十共5个房头，百顺堂分祭三、四、六、七、九房，亦5个房头，故此有“徐氏十大房”之称。其中的百顺堂建筑气派浩大，超过主祠堂，它处于仁寿堂近旁偏西北的石子弄西侧，坐北朝南，正厅称“大夫第”，“百顺堂”匾额由严嵩所题写。正门前种有两棵白果树，称青龙白虎。后“青龙”早死，“白虎”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人砍倒。民国十年（1921）时，以宗祠祭祀田的收入在宗祠西侧创办徐氏小学，供徐姓子弟读书，1949年后改称为东街小学，后再改为江南粮站。到20世纪90年代时，徐氏宗祠和小学在旧城改造中消亡。在北滨江路，现尚存徐氏洋楼，建筑别致考究。

上述四豪族宗祠之外，其他宗姓亦各有宗祠，知名宗祠尚有：

秘图王氏宗祠。余姚境内王氏宗族众多，所属支系有：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姚江开元派王氏、余姚孝义乡眉塘官人宅王氏、余姚上塘派王氏、余姚云楼乐安湖王氏、四明鹿亭上菁龙桥派王氏、四明山芦山上宅派王氏、余姚三山王氏等。王氏宗祠亦多，分布于所在乡村各处，难以细述。其中唯姚城内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因有心学大师王阳明为秘图王氏的第十世孙，名望特隆，成了姚江王氏的著名代表。秘图王氏宗祠坐落在余姚北城秘图山后的柴行街（今阳明东路的西段），坐北朝南，约有3进。宗祠东侧即是明代戏曲大师叶宪祖（黄梨洲岳父）的“抑抑堂”，阳明先生曾为之题写“抑抑堂”匾。王氏宗祠北首，即为洪氏宗祠，坐南朝北，门对宪卿第弄。1936年，按国民政府要求开办短期小学，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即在洪氏宗祠办起洪氏小学。1945年抗战胜利，随着教育区域扩大，洪氏小学改称为“五联小学”，遂将南侧的秘图王氏宗祠划入校区范围，校门亦改向南面的柴行街（现阳明东路），依附于“新建伯”石牌轩。1952年，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自后，校名亦多次变更，学校范围亦有所变迁，至今即为阳明小学，王氏宗祠遗址现成了石化公司经营部位置。

黄氏宗祠“继美堂”位处合宝弄南端，府前路北侧，乃姚城黄氏的大宗祠（此黄氏与黄宗羲所属竹桥黄氏无关）。祠宽5间，深3进，两边有厢房。正门前有木栅栏，大门上方悬挂“黄氏宗祠”横匾，正厅两边有议事室、账房、茶房、仓库、灶房、柴间等。后厅放置神主牌位。每当新春年节、清明前后，即在宗祠南面的姚江上停泊多艘大船，聚载黄氏子孙上坟，祭祀先祖。1949年后，宗祠用作为粮食仓库和粮油供应站，20世纪90年代，宗祠头进、二进被拆，尚存第三进。2020年，因建设“阳明古镇”而改造。

此外，姚城黄氏还有分祠“载懋堂”，在保庆王庙东侧，前后3进，结构完整，1995年为扩建保庆路而被拆除。

黄家墙门，由竹桥黄氏黄宗羲五世孙黄徵义建于清中期，位处管家弄100号，自南至北共4进。管家弄黄氏系黄宗羲长子黄百药支系所属，后楼

的楼上即安置黄宗羲长子长孙世系牌位。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有“忠端公祠堂”，在姚城黄氏分祠“载懋堂”对面，1996年11月因扩建保庆路而被拆毁。

清楼氏宗祠，在工人路（都司前）南侧，合宝弄西侧位置。夏禹苗裔，少康后为东楼公，国号杞，爵列伯。楼澧为东楼公八十三世孙，有孙楼俚，任河梁提举司、朝议大夫，入赘陈主事家，而卜居余姚东门，是为迁姚一世祖。楼俚生二子：长员益，次员义，派分楼氏二大房。其后衍为候青门、祝家渡、胜归山、雁塘畈、冶山、黄家桥各支。楼适夷即出员义房雁塘畈支下，是为迁姚第十九世孙。

叶氏宗祠，始祖诸梁公受封于河南叶邑。南宋哲宗年间，由南阳叶氏转徙南迁至余姚虹桥，再由虹桥迁居姚城，散居于府前路、武胜门内外、皇山桥、西旺埭等处。叶氏宗祠在虹桥，由叶氏迁姚二世祖叶梦牛始建。姚城内府前路之北侧，工人路之南，合宝弄西侧，尚存有叶家墙门、叶家四房老宅、叶家举人房，叶氏子孙牌位即放置于叶家墙门（小祠堂）的楼上。

周氏宗祠，宋建炎年间，礼部侍郎周兴裔扈从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嗣后散处各邑者不一，而迁徙余姚的最为兴盛。当时有宋明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六世孙周既立，始迁姚北孝义乡，为迁姚始祖。今聚族而居者数千家，支繁派别，其各自为宗的就有18支，向称“余姚十八周”。周氏散居在姚北，聚居在当时刚建成的大古塘一线，其中有几小支迁居城里，如县东街东侧的周家墙门。而迁居姚城之东北的上林乡的周氏子孙，建宗祠于石人山之东北里许的后周埭，咸丰十一年（1861）遭太平天国入浙军焚毁。

诸氏宗祠，位处东朝街西段，棖星桥东首的路南（现巍星路菜场），前后3进。诸氏原籍山东诸城县，约于两宋之际南迁浙江，分居浙东各地。时有诸姓兄弟两人，弟徙居第四门，兄徙居姚江南岸，即后来的江南城东泰门一带。多年之后人口繁衍，又散居于城下路、新西门、北城将坛等处。

杨氏宗祠，位处学弄孔庙东侧，棖星桥之西，前后3进。杨氏祖籍河南

巩县，于两宋之交迁徙浙江，其中一支分居姚江南岸。现工人路南侧尚有杨氏老宅。

罗氏宗祠，位处学弄，邵氏宗祠之西，前后3进。

金氏宗祠，位处义井巷弄，结构完好，坐北朝南，1950年为义井巷居委会办公场所，大厅用作剧场，时有地方戏剧在此演出。1992年为建设太平洋大酒店被征用拆除。

张氏宗祠，在义井巷十字街口东侧，20世纪50年代初用于驻军养马，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改建为手工业局；1992年被征用建设太平洋大酒店而拆除。另在义井巷东侧，金家祠堂的对面有张家支祠，坐南朝北，三进，进大门为大天井，有东西厢房，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义井巷小学，亦因征用为大酒店停车场被拆除。

韩氏宗祠，在南城之西的韩家仓前，结构完整。1956年因建造四明瓷厂被征用而拆毁。

吕氏宗祠在南城落马园，吕本阁老的宰辅第之西侧，玉兰堂之南。民国期间曾在此办过“国民平民小学”，以解决贫困孩童的入学问题。

宋氏宗祠，在保庆路东端的石巍桥江西岸，坐西朝东，两进，两边有厢房。

邬氏宗祠，在龙泉山北麓，由邬景从于清顺治年间所建。邬景从任行人司行人，每往外地传达诏命，地方官赠予丰厚礼金。即以此之获兴建邬家大院的同时，在邬家大院东侧兴建邬氏宗祠，坐南朝北，前后3进。民国三十三年（1944）改建为“余姚大戏院”，后易称“大众戏院”，1959年改建为人民电影院。

中国社会之组织，本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古人所说“家齐而后国治”，正是说对了。自周代时建立宗法制度，至今虽已废弃，但宗法之精神犹存。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社会生活一直秉承着《路史》所说的“亲亲，治之始也”的原则，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治家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无尊严则孝敬衰败，无君长则法度废

弃。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

要形成完整系统的宗法制度，就得有宗祠。有宗祠，就得有祭祀之法度。按规矩，祭祀必须有宗子（长子、长孙）。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也。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若流转四方，至亲不相识。至今谱牒又废，人家不自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爱淡薄。更有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纷争，其实皆为争财而已。使之按宗法相规，则无所争。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教于宗族。

宗祠订立有严格的族规，族长及部分房长、宗室知名人士组成议事阶层，统揽宗族大事。至近代，有些宗族还组成董事会，唯德高望重、具有一定资产者才可入董事会，族长任董事长。如邵氏宗祠就有董事会，凡宗族出现重大问题，有人犯族规，族内人等发生重大纠纷，均需到宗祠解决，俗称“开祠堂门”，由族长出面干预，近房房长、知名宗室人士参加。参与中族长一言定鼎，具有极大的权力。然而对宗室子弟来说，最怕见官打官司，甘愿“开祠堂门”解决。

凡宗庙，必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分居左右。凡祭祀，大宗主之。通过宗庙祭祀，可以孝父母、友兄弟、笃宗族、务正业、劝学业、尚勤俭、择交游、诚祭祀、禁欺公、端愉教、睦邻里。

祠堂最主要的事项是每年几次的祭祀活动。一般每岁需多次召集族众，合族祭祀祖先。重要的是新春的正月初一、清明、中秋节、冬至4次祭祀活动。正月初一，各宗族集合全族男丁到宗祠祭拜祖先。该日黎明，祠堂早早开门，由各房房长召集本房族众男丁，对祖宗举行祭拜，全堂肃穆，隆重严正。至辛亥革命之后始允许女眷参拜。至时连乡下同族男丁也要进城来参拜，该日祠堂内人头簇簇，热闹非凡。对乡下来的族人还得招待点心。

清明节，是上坟的日子，各宗祠都预先准备船只，船上各备有厨师、开水、餐具等。到时，各房房长召集本房族人，凡体力可行者均到祠堂前集合，由司仪招呼众族人依次上船，清点人数后开船，各奔墓地。一般在

墓地祭扫完毕，用过中餐，原船返回，再到祠堂前分散回家。

中秋节的活动较简单。一般辰时开始祭祖，不搞大集中，由各房自行率众祭拜，不论长幼，不论男女。拜完之后即由房长分发每人一份月饼，即行回家。

冬至日，是一个严肃的祭拜日子。该日由房长召集本族男丁到祠堂祭拜，有时由族长向年轻子弟讲解祖先功德、业绩、品德、贤行，规劝子嗣不可违犯族规，勤读诗书。

除祭拜之外，宗祠每年还需做好下列事项：

正月元宵节灯会的彩灯制作，大门彩牌楼，各宗祠之间为出风头，争奇斗艳，往往花费大力去置办。

每年多次祭祀活动时的供品预备，祭具的清洗整理，茶水的准备等。

每次祭祀活动要分发大饼。按理应分发馒头，但馒头易坏，不耐存放，故改发大饼。每当祭祀之期，祭祀结束后，每户男丁享受一份4个大饼。房长双份。如有做官的从县科级算起，读书的从中学算起，均以倍数累加份额。

祠堂财产的管理，每宗祠都有多少不等的财产，大族如朱氏、邵氏，还有义田或庄田，组成义庄。财产分房产和田产两类，房产除祠堂屋外，还有众多的店房出租，收取房租作为祠堂一大经济来源。如江北古城沿江段城墙拆毁后重建的原“三阳饭店”“一言堂”等店房，即是朱氏宗祠的房产。而更多的是田产，每年田租的收入是祠堂的主要来源。凡宗祠所需，一切由祠堂收支，如修祭、赈贫、优老、恤孤、助婚、劝学、崇行、输征、佐费等。

增丁入册，凡遇族内有人生育孩子，待满月后即将名字报给宗祠，登记入册。如此既可明了、统计族内人口的增减，又是为日后修谱做了准备。

安置神主牌位，凡遇族内有人亡故，待做“七七”（断七）之后，即将神主牌位送到宗祠，按死者在族内的辈分位置，把神主牌位放置于相应

位置。

修谱，每宗族大都每隔30年左右重修宗谱，由族长领衔，房长和知名宗室人士、有科举功名者，共同组成修谱班子，不领薪，唯有具体撰写人员支领薄薪。经费由祠产拨给，亦有捐赠的。待新谱修成，少量印刻之后，族长、房长、捐资者、宗室绅士、宗子等各领受一部。

姚北海塘

余姚海塘始筑时间较早，据《两浙海塘志》记载：“（余姚）前代作堤御海所从来久，文字残缺莫可考，功之见者始此云（指谢景初筑塘）。”宋庆历七年（1047），余姚知县谢景初见姚北濒海，岁苦海患，即召集民工筑塘御海，保障了姚北一带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宋庆历八年七月，时任鄞县知县王安石因谢景初之请，曾写有《余姚县海塘记》，载《王文公文集》。

自此之后，余姚海塘以云柯为界，分东、西两部。东起上林，西至兰风，全长绵延140余里。云柯之西为西部塘，包括谢家塘、王家塘、和尚塘，皆前人观水势底止，因便宜分部筑之。因由民间募资所修，其长短高下异形，其围筑年代不明。宋《嘉泰会稽志》载：“谢家塘在县北四十里，王家塘在县北四十一里，和尚塘在县北四十二里。”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周敦颐的六世孙周伯雨辗转迁居余姚县开元乡汝仇里叶郎桥之右（今水阁周村）。此地前环汝水，北近海塘，周伯雨之孙周俞即名其塘曰莲塘，名其水曰莲溪，名其别墅为莲花心庄，莲塘即属西部塘的一部分。

南宋庆元二年（1196），余姚知县施宿修筑上林湖至兰风海塘42000尺。并建海堤仓，以上林沙田及汝仇湖、桐木湖等处废地总两千收入备作修堤经费。

元至正元年（1341），余姚州州判叶恒将东部塘、西部塘留存泥堤全部易作石堤，计2万多。同时，叶恒出于对开元周氏先祖周敦颐人品学问的仰慕，遂将新修海塘命名为莲花塘，东部塘、西部塘之名遂自行消亡。

对此，明初余姚人赵考古（赵搗谦）曾写有一段有关莲花塘的文字：“莲塘题字——护龙宅，在四门水阁周村周兰畹家。水阁，有捍海塘障，名曰莲塘。盖祖濂溪（周敦颐）爱莲之意。吴元年，方国珍据温台，帝

（指朱元璋）命信国公汤鼎臣征之。又洪武十八年，汤帅复奉令，城濒海要地以备倭。两次历莲塘，感兰畹饷军，且致千金佐戎费，谕军士曰：“吾观周氏逼近海，恐此塘卑狭，不足御冲激，应高广之。”众于是踵筑数日，遂成大阜若山，即自书“护龙宅”三大字，令勒石表之。从此无海患。洪武十九年，邑人赵古则记。”（见民国《余姚六仓志·金石》）

自此之后至清末，各类文献均称莲花塘，而民间俗称后海塘。到民国八年（1919）编《余姚六仓志》时，始有“莲花塘，俗呼后海塘，今人竟称大古塘”的记载。

除大古塘之外，按地势所需，各处还先后修筑有较多的散塘，如《余姚六仓志》所言：“莲花塘之南北相距二里皆有散塘。”因“其制随地形上下，散漫不一”而得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兰塘，在旧兰风乡，莲花塘之南。《光绪余姚县志·水利·海堤》中写道：“明初，推官周公复筑兰塘，以抵怒潮，时莲花塘已奠固，塘南可不复筑，必系旧有散塘培高为陆，以便行旅。冯兰募修，故曰兰塘。”成化七年（1471）九月，海潮毁塘堤，溺死姚北沿海民众700多口。灾后，兴筑海塘。

此外，在今余姚境内尚有遗迹可寻的还有“省塘”，其具体修筑年代不详，位置在大古塘南，东起云柯漾山（今低塘洋山村），西至罗家山（临山湖堤村），全长30里，历来作为姚北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要道。沿省塘两侧，在明清两代先后形成低仰（今名低塘）、塘堰桥、第四门、湖堤等市集。在泗门镇水阁周村内，至今尚有一段保存完好的省塘，长石板铺成路面，高于周围地面半米，是姚北散塘最后之遗迹。

自后又先后构筑其他海塘，有：

利济塘——四塘；晏海塘——五塘，清嘉庆年间筑；永清塘——靖海塘，六塘，清嘉庆二十年至民国八年筑，俗称二圩、二丘；澄清塘——永宁塘，七塘，俗称三圩、三丘；千固塘——八塘，俗称四圩、四丘；万安塘——九塘，俗称五圩、五丘；在五圩后，还有六圩、七圩、八圩、九圩。

1949年7月24日，因遭台风大潮袭击，澄清塘及三圩塘以北海涂多处坍

塌。1950年春，在东起洋浦、西至上虞界的澄清塘、三圩塘原址上修筑新塘，改名解放塘，俗称五塘，也有称七塘。1992年出版的《余姚市志》记述解放塘时，也称之为七塘。1952年至2009年，解放塘之后又陆续围筑4条海塘。余姚水利部门均按原姚北东部地区的习惯称之为八塘、九塘、十塘、十一塘，并入载1992年出版的《余姚市志》，泗门、小曹娥、临山一带民间却不认同，仍按习惯称之为六塘、七塘、八塘、九塘。

文化遗产

余姚历史悠久，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建县，北宋时被范仲淹称为“东南最名邑”，明代又有“文献名邦”之佳称。双城烟雨，姚江东去，显示着余姚古城建筑格局的独特风貌，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记录在案的文物遗迹达659处。1991年10月，余姚被浙江省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省政府批准《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大量的历史遗迹除了岁月的自然吞噬之外，由于旧城改造至目前仅存260多处；老城区古建筑由1982年时的70余处，已经锐减至不足20处。

南雷路（江南直街）

最早形成于宋代，是“东南最名邑”的见证，北起通济桥南圯的北固门，向南直通南明门，全长1100米，宽4~16米。抗日战争时期改称南雷路。小方形石块铺就路面，沿街各式店铺排列，高低参差错落，独具江南城镇特色，是一条年代久远的老街，20世纪80年代开始拆除，到21世纪初全街拆除，已建成了一条近现代的新街。

酱园街

西起和鸣桥，东至芦蓬头，南滨姚江，全长1250米，是一条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原有致和、鼎和、具美3家酱园，咸腌酱油制品满街；又是朱姓大族的聚居处，有中宪第、探花墙门等遗存。1999年，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因改造而拆除。

秘图山

位处江北古城旧县衙内，山体不算高大，但体势独特。据文献记载是大禹治水时收藏秘图之所，原有“神禹秘图”碑，故称之为秘图山。早在东汉建安五年（200）时，由东吴孙权任命的余姚第一任“余姚长”朱然即

建县衙于此山之南麓，自此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增建、重修，台阁连绵南坡，衙门大堂前挖掘有百余平方米的荷花池。至20世纪末的1800多年间，秘图山前一直是余姚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所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有江浙行省郎中刘仁本在秘图山前仿照东晋时的绍兴兰亭会，重置曲水流觞，于此举行过一次影响较大的“续兰亭会”。这里，经越历代的不断修建，形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历朝有建有毁，众多文物积压于基础之下。尤其是清代咸丰年间，余姚发生十八局佃农起义，3次打进余姚城，冲入县衙，释放囚犯，把衙门物品抛入荷花池。随即又是太平军入浙，占据余姚城，把县衙古董抛散四周，扔入池中。当太平军撤离后，重修县衙门，大量文物被填压在房基之下。

舜江楼

又称鼓楼，故承宣亭址，元皇庆元年（1312），余姚州判官叶恒始建，历明清，多次整修，置钟鼓其上，晨钟一鸣，万籁俱起，真是美哉，为“文献名邦”旧城的标志性古建筑。楼的体势隆高，雄峙城墙之上。1984年2月25日凌晨被一精神病患者浇汽油焚烧，后来即时重建。

通济桥

在舜江楼南侧，又称“老虹（jiàng）桥”，三孔石拱桥，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现存石拱桥重建于清雍正七年，九年（1731）竣工。高大雄伟，势如长虹腾跨，巨舟穿越，“海舶过而风帆不解”，有“浙东第一桥”之称。20世纪50年代，为了方便山民手拉车过桥，对桥上的石阶梯进行处理，在离桥栏板1.2米处开凿宽0.4米的凹槽，浇成水泥斜坡。20多年后，随着手拉车的消亡，又将水泥斜坡挖掉，给每级石阶梯留下了毁损痕迹。再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出于对桥顶石狮子的怨恨，用铁锤猛砸敲凿，砸毁石狮，留下了使人难以释怀的痕迹。1999年年底，修理砌筑姚江江岸时，把该桥南桥洞东西两侧的古纤道给修没了。桥顶东西两旁护栏板外侧原有“浙东第一桥”和“通济桥”两块桥额石刻，至今因风化而消失。该桥重修至今已有290年了，因年代久远，承载了较多的岁月

风霜，风化失修，桥基危殆。

玉皇殿

在玉皇山顶，创建于宋代，明代万历年间扩建，前后4进，旁有厢房；另有茶亭、雁岭、雁井，名远著于浙东。20世纪60年代公社化时期，被凤山生产大队拆除。连带山麓的东岳庙亦被拆。西北侧有小玉皇山，曾是侵华日军杀害抗日人士的地方，于20世纪初被挖平山体，改建为公园，于玉皇山南坡竖立一块“毋忘碑”。

接待寺

明嘉靖年间迁建至西石山，又称断山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英夷沿姚江再入余姚境，焚烧城隍庙、岳庙、天后宫、龙泉寺、接待寺。后由幻堂禅师募资重建接待寺，格局壮观，为延纳十方行脚僧人之处。1958年，为满足拓建“龙山剧院”木材之需，即拆除接待寺殿宇，将巨大的金钢圆柱剖割为方梁木，用作剧场的房架。接待寺遂由此被毁没，只剩下一些零星厢房，后来分给了附近贫困农民。与此同时，为拓展龙山剧院地皮，将龙泉寺西侧6间配殿、天王殿西侧屋和山门西半部予以拆除。

胡公岩

位处离姚城之北1000米处的胜归山，原为胜归山庙所在。该庙经20年的营造乃竣工，崇敬晋将军刘牢之的义烈，胡宗宪之显赫，三宝之功德，建成前为复初书院，次为刘神祠，后为禅院佛殿，成为儒道释三合一的庙宇。四周凝聚着自明代嘉靖至民国长达500多年精湛艺术价值的石刻群雕，在整个浙东地区绝无仅有。庙宇毁于20世纪60年代。近30年，被山民开山取石，炸掉紧靠雕像群的半座山峰，毁掉大部分雕像。尚剩下的几十座佛雕像，由于被油漆涂抹，岩石中的水分不能外泄，造成隐性破坏。

严子陵祠

为纪念汉代高士严子陵（前39—公元41），晋太康四年（283）始建于严子陵故里姆湖村。唐开元六年（718）时，敕建庙于里南之严公山，赐额曰“严公庙”。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将严子陵祠迁建于离姚城之

东北5里之遥的客星山严子陵墓右。到咸淳七年（1271），又在客星山顶上创建高节书院。客星山西北麓的严子陵墓自汉代至民国，历代均有修葺。至明代，为了便于瞻仰，将严子陵祠迁建于余姚城内龙泉山东南坡，现存为清同治年间建筑，详情于《光绪余姚县志》有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客星山上新建高风亭。可惜的是，客星山建筑除少数因年代久远而逐渐湮没外，其余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被“红卫兵”破坏无遗。1982年文物普查时曾发现严子陵墓碑被低塘的村民搬去做了河埠石。1987年，墓碑被慈溪人运到慈溪峙山公园，2001年，移到慈溪博物馆。龙泉山上的“严子陵祠”，20多年前曾被个体户所租用，直到2003年严子陵祠收归为市园林管理所所有，布置陈列，供群众参观。

孔庙（余姚学宫）

原在大黄桥南侧位置，宋元丰元年（1078）迁建到学弄。按3条轴线部署，中线为学宫，有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东西庑、明伦堂、尊经阁；东线为孔庙，有文昌阁、崇圣宫、训导署、教谕署、土谷祠、斋堂号舍等；西线为名宦祠、忠义祠、乡贤祠。鼋鼉驮碑，碑刻排列；正门前为泮池、射圃；四周有垣，垣外东为举弄，西为糞弄，北为醢醢弄；体势壮观，属于江南地区典型的祠宇建筑。解放初改造成粮食仓库，20世纪60年代时殿宇被拆除，碑刻被敲断，平为学校操场，搭建部分房舍；残存的东侧偏殿于1996年被拆除。

试院

原在县衙东侧，清同治年间由本邑乡绅捐款兴建，内有“达善堂”等建筑，另有阅卷房、号棚60间，头门、龙门、角门、甬道、厨房、土地堂等。清末维新运动时期，1898年于此创办达善学堂，后转称为余姚官立高等学校、余姚县立第一小学、府前路小学（东风小学前身）。1950年，学校搬迁到酱园街新址，房屋借用为县府办公用房。20世纪60年代，拆除部分试院房屋，作为兴建大会堂用地；70年代借用试院剩余房舍，兴办县第二招待所。1995年，于此兴建秘图山住宅楼群。

城隍庙

宋代时，由县衙之西移建至县衙东侧，正门朝向县东街。内设戏台、4进殿宇、东西厢房。正门外有龙神祠、风神殿。民国时期，借用城隍庙作为群众集会场所，称“中山厅”，并设有浙东日报社等办事机构。1949年后，用作县政府机关食堂，撤掉正门前牌轩；20世纪80年代，拆除头门，移建到龙泉山（中天阁之西），拆除第一进大殿，后殿位置改建为厂区用房，再建为商业用房。现仅存一幢殿宇。

南雷瑞应王庙

简称“南庙”，晋咸宁年间初建，宋代重建，体势壮观，庙前有古大木。20世纪50年代，庙毁，扩建为小学用地。

宰辅第

是明代嘉靖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吕本的宅第，门厅、前厅、后厅、御书楼，依次而入，气派豪华，格局森严。大门前有一对黑色大理石狮子，相传是严嵩仿照故宫狮子式样雕凿而成，连座高达2米多，用船运到余姚送给吕本的，威严壮武。1958年“大跃进”期间掀起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高潮中，这对石狮子被敲碎，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样式漂亮的3间御书楼成了粮食局的粮食仓库，20世纪70年代时，御书楼和前厅被拆除，在御书楼遗址上新建一幢楼房作为粮食局职工宿舍。四周厢房及第三进楼房还大致保持原来格局，只是被搬入的居民分隔成多个单元而已。到80年代，门厅被住户分隔披搭，前厅之北的豪华石质仪门危势重重，即将倒塌。失掉了豪华气象的宰相府第，与现存于绍兴的完整的另一府第“吕（本）府十三厅”不可同日而语。

黄梨洲墓

在离余姚城东南10余里的化安山，古朴简淡，纪念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黄梨洲（1610—1695），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姚江书院

始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原址在城南双雁里半霖史家沈氏旧

宅，院内堆筑讲坛，前为堂，中堂悬挂孔子像；后为楼，奉王阳明像，徐爰、钱德洪配享。至崇祯十五年，已形成格局完整的书院体系，起到祭祀、藏书、讲学的三大书院功能，于阳明故乡延续“姚江一灯”，标志着姚江书院派的正式形成，是“阳明学说”在浙东传播的大本营。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继任书院主讲的邵廷采将书院由城南的半霖迁入城南南滨门内巽水门角声苑（现巍星路菜场之南侧），恢复旧观，给学子带来极大便利。详见由邵廷采编辑的《姚江书院志略》。1992年，因余姚镇玻璃厂增建厂房，由该厂代表提出议案，经市政府批准而拆除。

邬家道地

在阳明故居瑞云楼之东南，是清顺治年间由行人官至按察佥事的邬景从所建。行人司行人品级虽低，却是肥缺，受朝廷差遣传达诏命，地方官均向行人送上一份厚重的财礼。邬景从财力豪富，即将宅第从酱园街迁建到龙泉山北麓，兴建豪宅，前后4进；有东、中、西3道大门，成为深宅大院的建筑群。院落之西有邬家花园。东侧建造邬氏宗祠，民国时期被改建为“余姚大戏院”，800多个座位，1949年改称为“大众戏院”，1956年停止演出，1959年于戏院旧址改建“人民电影院”。邬宅后进被拆除，改建为2层楼的越剧团职工宿舍；1982年，邬家大门被拆，建造5层商住楼。现在保留有第二、第三进正屋及西轴线的侧屋。

谢文正祠

在龙泉山南坡，祀明代大学士谢迁；前有褒忠祠，祀谢迁玄孙谢志望。因失于维修而破败，基本格局尚存，20世纪50年代末被拆除。

秘图王氏宗祠

在秘图山后，柴行街北侧，为“姚江秘图山派王氏”祠，即王阳明的祖祠。祠堂前有“新建伯”石坊。抗战胜利后王氏宗祠改为学校（柴行街小学），校门亦改向南面的柴行街（现阳明东路）。1965年1月，“新建伯”石碑轩被拆。

洪氏宗祠

在秘图王氏宗祠之北，门对宪卿第弄，1936年，改办洪氏小学，1945年抗战胜利，改为“五联小学”，与南侧的秘图王氏宗祠统一为校区范围，1952年，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

闻人铨故居

位处宪卿第32号，是王阳明学生、姑表弟闻人铨、闻人闾的故居，于20世纪80年代因扩建化纤厂而被拆除。

霍宅

位处智慧桥路73号，前2进于20世纪80年代建造桐江桥菜场时被拆除，现尚存破败的后进。

将坛（诸姓居宅）

在智慧桥路上，前后3进为明代建筑，20世纪80年代因建造桐江桥菜场而被拆除。

大方岳第

在武胜门路41~45号，明代建筑，紧临王阳明故居东侧，是王阳明少年时的读书处，20世纪80年代开始拆除台门和东侧套楼，西侧套楼已倾斜。

抑抑堂

是明代戏曲家叶宪祖的故居，黄宗羲的岳父家，明代建筑，于1995年因建造石化公司经营用房而被拆除。

理学旧居

位处宪卿第7号，是王阳明的老师、后出任广东石城县知县的陆恒的故居，王阳明曾题写“理学旧居”匾额，1995年旧城改造中拆除。

江北进士第

位处原人民东路2号，明代建筑，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改建中被拆除。

贞烈祠

在原石巍桥之西，明正德年间为祭祀姜荣妾窆氏之贞烈而建，倪宗正写有碑记。20世纪50年代成为民居大杂院，1986年为扩建巍星路而

拆除。

绪山庙、邹孝子祠、三锡祠、朱氏宗祠、朱氏义庄

同处在龙泉山南麓，龙泉山南门的西侧，各被先后用作为：绪山庙，“文革”前曾一度做过县文化馆、图书外借部，20世纪80年代改建为4层楼，1楼为余姚越剧团团部，2楼以上是文化局办公室，保存原样的头门；绪山庙之西即为邹孝子祠，邹孝子祠之西侧为三锡祠（祀胡宗宪），“文革”前曾用作展览馆，后为县文化馆及图书外借部；三锡祠之西为朱氏宗祠“一本堂”，20世纪60年代作为展览馆，20世纪80年代拆建为教育局、图书馆、文保所；朱氏义庄，先是作为粮食仓库，21世纪拆除，后来改建为名人馆、商业用房。20世纪90年代，绪山庙、邹孝子祠、三锡祠、朱氏宗祠、朱氏义庄全部被拆除。

武安王庙（关帝庙）

位处龙泉山西麓，明洪武二十年（1387）初建。嘉靖年间，管见、钱德洪等拓建，庙前原有韩应龙状元牌轩，抗日战争时期被拆毁；20世纪60年代，头门、大殿、二进大殿被拆除，庙门内仅存古月池仙桥；厢房供居民杂居；20世纪90年代改建为余姚手表厂，后废。留存的南侧偏殿现为市文保所办公室。

燕怀里

位处燕怀里12~13号，明代洪氏巨宅，于1996年因建造民居而被拆除；它的后宅楼木材被迁建瑞云楼主楼。

黄氏宗祠“继美堂”

位处合宝弄南端、府前路北侧，1949年后作为粮食仓库和粮油供应站，20世纪90年代，宗祠头进、二进被拆，尚存第三进，现因建设“阳明古镇”而改造。

五进屋

位处工人路121号，明代都司衙门，是典型的明代建筑，于1998年因新建居民楼被拆除。

中宪第

位处酱园街188号，是清代道光年间一甲第三名探花、内阁学士朱兰的故居，前后5进，门厅悬挂“中宪第”匾额。1999年10月因建造“舜江名苑”时拆除。

四明阁

位处酱园街，是内阁学士朱兰的藏书楼，因建造“舜江名苑”于2000年被移地迁建于龙泉山西麓，没有恢复原建筑风格，亦失去了藏书的功能。

楼适夷故居、1927年中共余姚城区支部活动旧址

位处高阶沿路68号，2层4四间楼房。楼适夷生前曾将旧居赠予余姚市政府，以用作“中共余姚城区支部活动纪念室”，由余姚市文联管理使用，并承诺赠予20多万卷古籍图书。因建造“舜江名苑”于2000年被拆除。

尚书第

位处高阶沿路320号，是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翁大立故居，于2000年因建造“舜江名苑”而被拆除。

蒋梦麟故居

是近代著名教育活动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花园居宅，于2002年1月被人民医院征用而被拆除。

太守房

原为太守房路36号，是清代嘉庆年间山西太原知府史梦蛟的故居，史梦蛟曾为全祖望校刻《鮚埼亭集》，2002年5月被人民医院征用而被拆除。

修文里

位处杜义弄东端，是明代初年参与《元史》修撰的宋禧故居，1999年因扩建杜义弄而被拆除。

会元房

位处东朝街，莫家弄西侧，是清代著名历史学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会元邵晋涵故居，在20世纪80年代因建造巍星路菜场而被拆除。

诸氏宗祠

位于东朝街，原棖星桥东南，莫家弄口西侧，20世纪80年代因建巍星路菜场被拆。

保庆宁邦王庙

位处矮凳桥东侧，宋绍兴年间初建，清末重建，1996年因扩建保庆路而被拆。同时，矮凳桥亦被填没，改成水泥路面。

载懋堂

位处保庆路100号，是学弄黄氏的宗祠，前后4进，1996年因为扩建保庆路被拆除。

宫保第

位处南城杜义弄7~8号，是明代太子太保史琳的故居，1999年10月因扩建杜义弄被拆除。

黄忠端公祠

位处保庆路96号，是黄宗羲之父、东林党骨干人物黄尊素的纪念祠，1996年11月因扩建保庆路而被拆除。

天官府

位处保庆路，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吕天成故居，1996年8月扩建保庆路而被拆除。

江南进士第

位处潭井弄61号，是清乾隆年间进士陆烈故居，有多进厅堂和花园“柳园”，2001年11月被拆除。

赵考古祠

在笋行弄内，虽然尚存，但居民随意分隔搭建，成了繁杂的大杂院落，淹没于众杂民居之中。

徐氏宗祠

在姚江南岸，石巍桥西侧，前后5进，体势壮观，正门有王阳明题字

“徐氏宗祠”匾额。20世纪60年代被火焚毁，仅留下头门未焚毁。遗址被修建成民居大院，1990年，因建造余姚仪表厂而被全部拆除。

百顺堂

徐氏支祠，在江南石子弄内，体势壮观，“百顺堂”匾额由严嵩所题写。1992年年底，因建设太平洋大酒店而被征用拆除。

史氏宗祠

在义井巷弄南侧，体势庞大，20世纪90年代征用为太平洋大酒店停车场被拆除。

张氏宗祠

在义井巷十字街口东侧，20世纪50年代初用于驻军养马，60年代被拆除，改建为手工业局；1992年被征用建设太平洋大酒店而拆除。

金家祠堂

1950年为义井巷居委会办公场所及会堂，结构完好，1992年因征用建设太平洋大酒店被拆除，对面的张家支祠（义井巷小学）亦被拆除。

韩家小祠堂

位处下寺桥之西原称朝街第的转角处，1949年后曾作为十三村的会堂，节假日供戏剧演出，是城乡交会处的一个娱乐场所。1956年因建造四明瓷厂被征用而拆除。

韩家宗祠

在江南城之西的韩家仓前，前后3进，四周高围墙，1959年因余梁公路改道，建造姚江桥而被拆。

韩家大厅

又称“梅生记”，位处下寺桥西侧，新西门内，据传是由明代吕本阁老出资建造，有韩姓等住户多家，新中国成立后还做过十三村会。笔者原住新西门内，父亲是十三村村主任，当时年少，曾常到离家不远的韩家大厅玩耍。1956年因建造四明瓷厂，征用地块，撤销十三村，动迁村民住户搬离，韩家大厅亦被全部拆除。

翰林房

位处管家弄内，前后5进明代建筑，是极典型的官宦居宅，2017年2月11日（元宵节）发生火灾，烧毁西厢房。

宜春堂

位于现天主教堂东南方向，工人路86号，占地约2100平方米，系叶氏宅院，由前楼、后楼、东西厢楼及3座砖雕门楼组成，有着余姚城区世居家族大院的格局。2018年6月16日，宜春堂发生大火，共有14家住户不同程度被焚毁。

状元楼

位处泗门镇，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大学士谢迁的读书处，整幢房屋因年代久远而下沉，于2014年重修。

谢氏始祖祠堂

位处泗门后塘河，经波折，1995年得以修整。

万安桥

位处原“成之庄”的护庄河上，1996年时护庄河被全部填没，由此使得始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的“万安桥”成了一座突兀于马路中间的旱桥。

历山

俗呼沥网山，海拔50米，地处低塘街道历山村之西，据传是舜帝耕作之处，据《光绪余姚县志·山川》载：“历山在县西北四十里，有象田、舜井、石床诸迹。”后来还建有舜帝庙，有着众多的历史遗存。正因为是舜帝耕作之处，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写有《余姚历山赋》予以赞赏。20世纪60年代始，庵东围垦六塘海堤（后七塘海堤）需要石料，到历山开山打石。历山公社、地方村镇砍树平山，到70年代末，仅仅几年工夫就将整座历山蚕食殆尽，现只能见到少量的山基痕迹而已，大部分已建成村民居住区。

“临山卫”卫城

始筑于明代洪武二十年，是明代初期浙东三大卫所之一，嘉靖年间俞大猷、戚继光等在此设卫屯兵、抗击倭寇，是一处极有历史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临山卫城占地辽阔，按《临山卫志》载：“本卫东至三山所六十里，西至沥海所六十里，南至余支湖五里，北至海五里。”“卫城东西座平陆，南座龟山之岗，北座凤山之岗……周围五里三十步，高二丈。”卫城东南西北设有4座城门和1座水门，城门各建1座城楼。城外东、南、西三面建有深濠，与城中东西向内城河贯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化时期，为了进出方便，把遗存的古城墙夷为平地，深具历史价值的古卫城遗址毁于一旦。2007年，于城南龟山原迎薰门（南门）遗址处，炸山辟路，于山脚下建造南城门，城上再建仿古城楼。

禾山

在县西北25里，前后两峰，海拔74米，位处马渚镇天元村和朗霞街道天华村之间。山坡上原有明代大墓多座。按《光绪余姚县志·冢墓》载：“参议王纲墓在禾山。”按《王文成公全书·世德记·王性常先生传》载：王阳明六世祖王纲被海寇杀害于广东增城，其子王彦达以羊革裹尸，负之归余姚，得以归葬禾山。据采访禾山王家村村民（该村民属开元王氏，不属王阳明的秘图山派王氏）所言，他们也知道有王阳明祖墓在禾山。可惜的是，属开元村的前禾山自1988年开山采石，至2010年夷为平地，后来整地约150亩；属天华村的后禾山面积比前禾山更大，亦先后毁没，后来整地约200亩。两禾山毁没后，大部分夷为农田，填补了农田建房的田亩数，前几年又于此盖起了企业厂房。

竹山

又称伯山，在丰山东南麓位置，即现在阳明街道丰山前村的南侧。《光绪余姚县志·山川》载：“伯山，在凤山东南，初亦名竹山，后以新建伯祖墓所在，改名。”叶维廉《姚江小志》中亦有相同记载。据《四明上菁王氏宗谱》载：“王纲墓在禾山，王纲之子王彦达墓在竺山大樟树

下，王彦达之子王与准墓在竺山，王与准之子王世英、王世杰、王世昌墓在竺山，王粲墓在竺山祖堂前。”由此可知，新建伯王阳明的五世祖王彦达、四世祖王与准，以及三世祖王世英等祖墓都在竹山，故又称竹山为“伯山”。20多年前，丰山与竹山之间修筑绕山麓而过的西环北路，伯山由此即成为孤立存在的小山头。经过几年的挖掘，至2015年竹山整体挖掘殆尽。